

分类号 F20/104  
U D C \_\_\_\_\_

密级 公开  
编号 10741

兰州财经大学

LAN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 硕士学位论文

论文题目 财政分权对黄河流域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

研究生姓名: 白昀珠

指导教师姓名、职称: 韩妍 副教授

学科、专业名称: 应用经济学 国民经济学

研究方向: 宏观经济管理

提交日期: 2023年5月30日

## 独创性声明

本人声明所呈交的论文是我个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尽我所知，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与我一同工作的同志对本研究所做的任何贡献均已在论文中作了明确的说明并表示了谢意。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白明珠 签字日期：2023.5.30

导师签名：郝妍 签字日期：2023.5.30

## 关于论文使用授权的说明

本人完全了解学校关于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各项规定，同意（选择“同意”/“不同意”）以下事项：

- 1.学校有权保留本论文的复印件和磁盘，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复制手段保存、汇编学位论文；
- 2.学校有权将本人的学位论文提交至清华大学“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用于出版和编入 CNKI《中国知识资源总库》或其他同类数据库，传播本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白明珠 签字日期：2023.5.30

导师签名：郝妍 签字日期：2023.5.30

# **A Study on the Impact of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on High-quality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Candidate : Yunzhu Bai**

**Supervisor: Yan Han**

## 摘要

高质量发展是时下热点之一，二十大报告中更是将高质量发展提为首要任务。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是高质量发展的重点之一。黄河流域生态环境脆弱，区域间要素差异大，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滞后，内生动力不足，在如今经济发展的背景下，产业尤其是农业产业的转型发展迫在眉睫。事实和经验表明，在我国财政分权的背景下，地方政府在经济中拥有更大的决策权和自主权。本文的重点是考察财政分权与黄河流域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财政分权体制作为改革开放以来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制度性因素，对解决黄河流域农业发展问题、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具有重要作用。

首先，本文综述了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将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作为黄河流域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测度指标，使用超效率 DEA 模型测算了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并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对 2009-2020 年中国黄河流域沿线八个省（市、区）的财政分权指标和农业高质量发展之间存在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分析。基于此，本文建立了财政分权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杜宾模型，采用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为被解释变量，分别以财政自主度和支出分权为解释变量，再选取金融信贷水平、工业化水平、教育程度以及市场化程度作为控制变量，研究财政分权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研究发现：（1）基于财政自主度，财政分权对于黄河流域全流域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正向的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2）支出角度下，财政分权对黄河流域各省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抑制作用。

本论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两点。财政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适应新形势、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因而首先明确财政分权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直接和间接作用的差异，充实了高质量发展有关理论；其次运用空间杜宾模型证明财政分权对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整体效应和空间效应，对比分析不同分权指标作用的空间差异性。

**关键词：**财政分权 高质量发展 黄河流域 农业全要素生产率

## Abstract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s one of the hot spots nowadays, and the top 20 reports put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s the top priority. Deepening reform of the fiscal and taxation systems is one of the priorities fo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is fragile, the factors between regions are very different,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raditional industries lag behind, and the endogenous power is insufficien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urrent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industries, especially the agricultural industry, is imminent. Facts and experience show tha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in China, local governments have greater decision-making power and autonomy in the economy. This thesis focus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high quality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system, as an important institutional factor to promote economic growth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solving the problem of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realiz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 and improving the ability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irst of all, this thesis reviewed the relevant research status at home and abroad, took agricultural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as an indicator to

measure the level of high-quality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and used the super-efficiency DEA model to measure agricultural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indicators and high-quality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eight provinces (municipalities and districts) along the Yellow River Basin in China from 2009 to 2020 was studied and analyzed by using the spatial Durbin model. Based on this, this thesis established a spatial Dubin model of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agricultural TFP. With agricultural TFP as the explained variables, fiscal autonomy and expenditure decentralization as explanatory variables, and financial credit level, industrialization level, education level and marketization level as control variables, this thesis studied the effects of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on agricultural TFP.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Based on fiscal autonomy,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has positive direct and spillover effects on agricultural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2)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xpenditure,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has an inhibitory effect on agricultural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n the provinces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The innovation of this thesis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wo points.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country's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finance must adapt to the new situation and meet the people's ever-growing needs for a better life. Therefore, the

difference of direct and indirect effects of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on agricultural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was clarified, and the theory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was enriched. Secondly, the spatial Durbin model is used to prove that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has overall and spatial effects on agricultural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and the spatial differences of different decentralization indicators are compared and analyzed.

**Keywords :**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 Yellow River Basin ; Agricultural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 目 录

<b>1 绪论</b> .....	1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
1.1.1 研究背景 .....	1
1.1.2 研究意义 .....	2
1.2 研究内容及框架结构 .....	3
1.2.1 研究内容 .....	3
1.2.2 研究方法 .....	4
1.2.3 研究技术路线图 .....	5
1.3 本文可能的创新点 .....	6
<b>2 文献综述及述评</b> .....	7
2.1 财政分权研究综述 .....	7
2.1.1 财政分权概念研究综述 .....	7
2.1.2 财政分权测度研究综述 .....	7
2.2 高质量发展研究综述 .....	9
2.2.1 高质量发展内涵研究综述 .....	9
2.2.2 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测度研究综述 .....	11
2.3 财政分权对高质量发展影响的研究综述 .....	12
2.3.1 财政分权对高质量发展的积极经济影响 .....	12
2.3.2 财政分权对高质量发展的消极经济影响 .....	13
2.3.3 财政分权对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	13
2.4 文献述评 .....	14
<b>3 相关理论</b> .....	15
3.1 财政分权相关理论 .....	15
3.1.1 第一代财政分权理论 .....	15
3.1.2 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 .....	15
3.1.3 中国式财政分权理论 .....	16
3.2 经济增长相关理论 .....	17

3.2.1 马克思主义经济增长理论.....	17
3.2.2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	19
3.2.3 政府与市场关系理论.....	19
3.3 财政分权影响经济增长机理.....	21
3.3.1 直接效应.....	21
3.3.2 间接效应.....	22
<b>4 黄河流域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与财政分权水平测度.....</b>	<b>25</b>
4.1 黄河流域农业经济发展水平测度.....	25
4.1.1 超效率 DEA 模型建立.....	25
4.1.2 变量选取及数据收集.....	25
4.1.3 测算结果及说明.....	26
4.2 财政分权水平测度.....	28
4.2.1 指标选择.....	28
4.2.2 测算结果及说明.....	29
<b>5 财政分权对黄河流域农业高质量发展影响的实证分析.....</b>	<b>32</b>
5.1 空间回归模型.....	32
5.1.1 模型确定及变量选取.....	32
5.1.2 模型结果及分析.....	34
5.1.3 稳健性检验.....	36
5.2 异质性检验.....	37
5.3 门槛效应.....	39
<b>6 研究结论、政策建议及展望.....</b>	<b>43</b>
6.1 研究结论.....	43
6.2 政策建议及展望.....	44
<b>参考文献.....</b>	<b>48</b>
<b>致 谢.....</b>	<b>54</b>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实力飞速提升，如今更是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力不容小觑。但是在开放初期，由于经济活力的极度缺乏，我国将经济发展重心放到了工业尤其是重工业上，虽然经济效益立竿见影，对生态环境却造成了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当前，中国正步入经济增长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正在由快速增长向质量增长转化，由注重“量”向强调“质”转化。二十大报告将高质量发展提为发展的首要任务。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由于各区域间经济基础有差异，加之发展经验和水平参差不齐，故而需要针对性看待不同区域的经济高质量发展。黄河流域是中国重要生态屏障与经济地带，更是“脱贫攻坚”重点地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于 2019 年 9 月份调整为我国的重大战略。但要促进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并不容易，目前，黄河流域仍然存在着流域生态环境薄弱的问题、区域发展的质量亟待提升等主要问题，因此，有必要从多个方面促进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而财政分权作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种重要改革手段，亦成为推动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一个切入点。黄河流域内的淮海平原、汾渭平原、河套灌区粮食和肉类产量占全国 1/3 左右，是中国重要的农产品生产区，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农业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同时财政分权所起到的调节作用对于沿黄河流域的各省份来说更多的体现在农业上，尤其对农业生产而言更为明显。为了提高沿黄地区农民的收入水平，促进黄河中下游区域农村乡村振兴建设，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来推动农业现代化进程。其中包括农业税收政策和鼓励资金等方面，农业优惠政策和鼓励性政策都能够直接影响农业经济效益，因此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更能体现黄河流域经济发展的状况。

财政分权与财税改革密不可分。中央从 1994 年开始分离部分税收权利给地

方，分设国税、地税两大征收机构，逐步划分中央和地方各自的事权，尽管在此后的十多年内中央政府不断尝试微调财税结构，但是分权合理的平衡点一直未能寻找到，成为财税体制改革的一大难点，也成为了各级地方政府和政治、经济学界关注的焦点。财政分权改革一贯以来就烙印着浓郁的中国特色，其影响中国整体经济快速发展的效力有目共睹，在中国式财政体制下地方政府以提高GDP而竞争的行为经济飞速发展注入了充盈活力。财政分权理论的兴起，引起了各方学者的激烈讨论研究，不管是以财政分权作为背景抑或是观察指标，都涌现出一大批研究经济增长和体制改革的文献和差异化的结果。已有文献多聚焦于探讨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数量上也就是规模所存在的影响，对于经济增长质量的研究随着高质量发展的提出也逐渐丰富，但目前还没有取得一致。因此，有必要从宏观层面探究财政分权如何作用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本论文将结合现实背景和相关的理论机制，通过实证检验，讨论了财政分权程度如何影响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以期掌握财政制度改革方向。

### 1.1.2 研究意义

财政分权作为国家的一项重要职能，既把控着供给端，也影响着需求端，是追求经济高质量发展路上不可缺少的明灯。自1978年以来，税收改革的不同阶段和背景适应了当时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如“分权分利”、“分税制”、“公共财政体制”和“现代财政体制”。目前，中国致力于落实高质量经济发展的新理念，特别是在经济发展处于关键时期的黄河流域。本文的观点是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可以从财政权力下放着手，也就是财政分权。然而，高度的财政分权也会导致地方政府过度追求经济增长，忽视环境保护。因此，本文将研究财政分权对黄河流域高质量经济发展的影响，以便更好地引导制度和政策发展。

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十分脆弱，各地区之间要素禀赋存在较大差异，传统产业转型升级速度落后，内生动力不强，经济的转型发展迫在眉睫。财政分权制度是改革开放以来促进经济增长最主要的体制性因素之一，它在破解黄河流域的环境污染问题，实现经济发展转型，增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等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本研究探究财政分权对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在理论与实践上都有重要意义。

## 理论意义

财政自古以来便是国家的命脉，财政政策作为“看不见的手”的有力工具，深刻影响我国经济发展，财政分权体制又是财政政策的重要支柱，它丰满了财政政策，在当下来看，其带来的竞争性又把握着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效保障。本文系统的分析并实证检验了财政分权对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的影响，并且丰富了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研究。

## 现实意义

财政分权体制改革始终贯穿于人们的生活之中，地方政府偏好和努力程度与分权效应直接相关。从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实际情况来看，中央对于区域经济发展的政策往往是以财权为主进行划分的，即事权为主体而支出责任为客体。事权与支出责任不相适应的，便带来了不少的麻烦，例如，产能过剩，市场恶性竞争，公共物品供给不足等等，因而给居民的生活生产带来了不利影响，阻滞了地方经济的发展，扩大经济危机的风险，并且最终影响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因此，如何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财权事权关系，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健康发展是当下我国的重要议题。因此，财政分权体制的深化改革安排成了当今一个时代课题不足为奇。从它的经济意义上讲，黄河流域实现高质量发展，有利于流域各区域加强合作，取长补短，有助于缩小黄河流域东西差异，分析和研究财政分权在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特别是积极作用，还可以为充分释放财税改革红利，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效借鉴。

## 1.2 研究内容及框架结构

### 1.2.1 研究内容

本文共分为六章，各部分内容概括如下：

第一章：绪论部分。本章主要讲的是研究该课题的背景和意义，然后叙述本文使用的研究方法，最后构建本文的研究技术路线图，指出可能存在的创新点。

第二章：文献综述及述评。从财政分权、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财政分权对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相关研究等方面系统地归纳总结了国内

外的研究状况，以期对本论文研究有所帮助。

第三章：相关理论。本文对财政分权相关理论和经济增长相关理论进行回顾。其中，财政分权理论分为第一代、第二代和中国式财政分权理论三部分；经济增长理论分为经济发展理论、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和政府与市场关系理论三部分；财政分权影响经济增长机理分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两部分

第四章：全要素生产率测度与财政分权水平测度。本文采用超效率 DEA 模型测量黄河流域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指标，以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占比为基础测度的财政支出分权指标，以地方政府自有收入占支出比重为基础测度财政自主度分权指标。

第五章：财政分权对黄河流域农业高质量发展影响的实证分析。采用空间杜宾模型，使用省级数据实证检验财政分权与黄河流域农业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并建立门槛效应模型，结合空间效应对实证结果进行分析。

第六章：研究结论、政策建议及展望。本章体现论文的研究结果，并依据得出的结论提出恰当的政策建议。

## 1.2.2 研究方法

一是文献研究和理论阐述。本文通过查阅大量文献收集财政分权和黄河流域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联系，梳理清晰两者的本质及现状。同时，综合运用财政分权和经济增长等有关理论，考察了分权对于经济增长质量水平可能产生的作用机理，然后为下文的实证分析打下理论基础。

二是定量分析。在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基础上，测算黄河流域的经济增长质量。在已有研究理论的基础上，对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内涵进行了理性界定，基于财政分权和经济高质量水平测度和现状观察，实证考察财政分权在黄河流域农业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

三是比较分析研究法。常见的分析方法之中，比较分析研究具有宏观性和客观性，比较分析研究又分为纵向和横向比较。纵向分析主要聚焦于时间分布，分析的是同个目标地区在不同时间点上体现出的变化，横向比较分析则是以空间为参照物，分析各区域间在同一时期不同的表现。本文结合二者，测算了沿黄河流域各行政省区近 12 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并进行比较。

### 1.2.3 研究技术路线图

本文的结构框架如图 1.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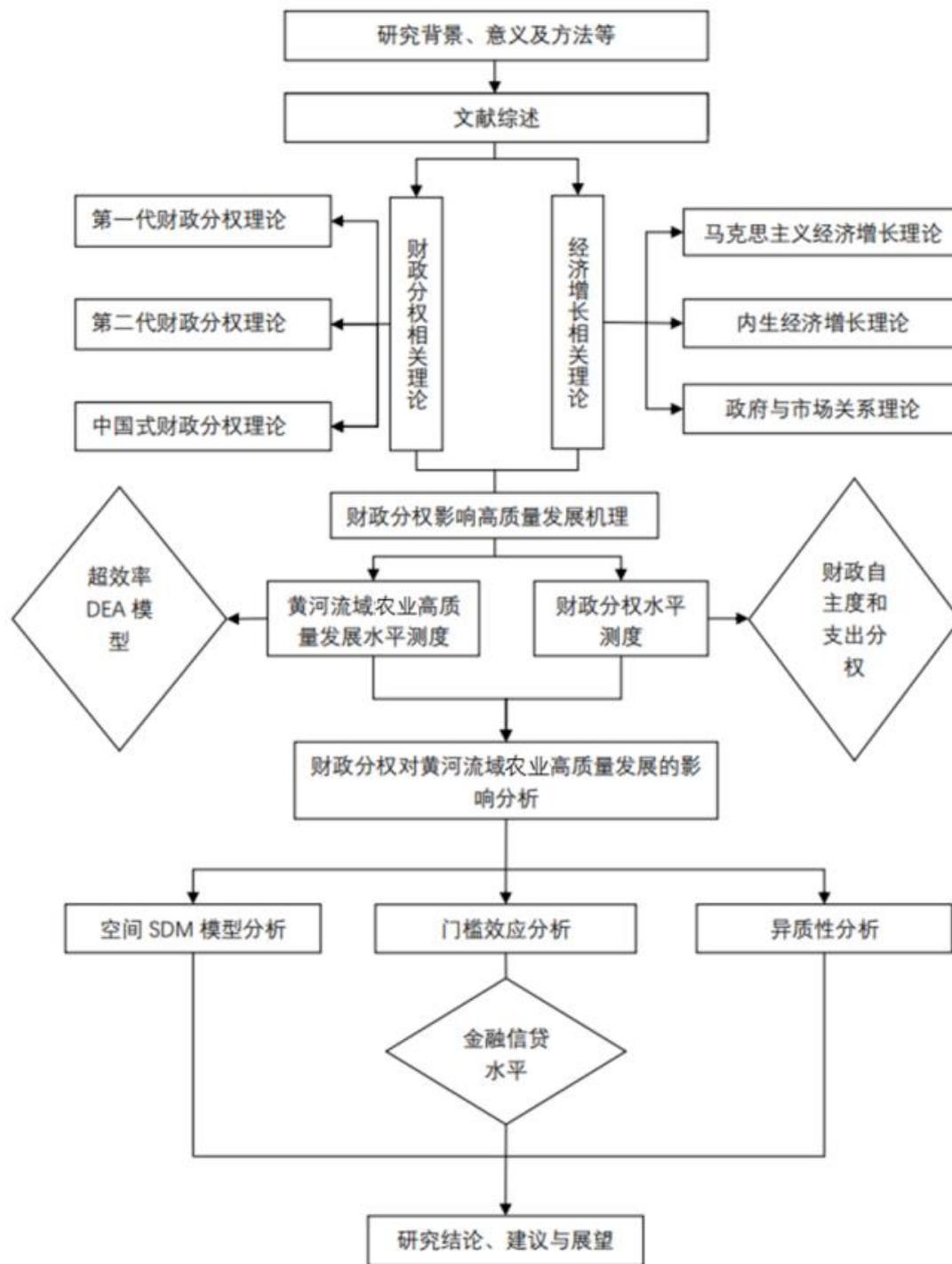


图 1.1 技术路线图

### 1.3 本文可能的创新点

第一，研究视角的创新。当前对财政分权与黄河流域优质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较少，已有的研究多集中在黄河流域的资源环境，产业发展等方面、环境治理等等，本文关注经济发展中财政分权问题，检验了财政分权在黄河流域农业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

第二，使用空间杜宾模型论证了财政分权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总体影响与空间效应，比较了不同分权指标影响的空间差异性。

## 2 文献综述及述评

### 2.1 财政分权研究综述

#### 2.1.1 财政分权概念研究综述

传统的财政分权理论是由 Tiebout 提出初步理论，然后 Musgrave、Oates 等经济学家对此作出补充和发展。Tiebout（1956）认为居民具有自由的权利选择居住地，分权下的政府会努力实现帕累托最优状态。而 Oates（1969）认为在财政分权的情况下，居民作为理性人会衡量自己在各地区所得到的公共物品和服务的质量效益，从而择优定居。

新一代的财政分权理论，将激励相容和机制设计学说引入到分权框架中，就是将当代微观经济学应用于财政学，这一新分权理论建立在 Qian 和 Roland 基础之上，以 B.Weingast 和 D.E.Wildasin 为代表，在财政分权方面，他们更关注的是如何建立一个符合公共政策制定者利益的体制。他们强调，由于中央政府拥有绝对权力，因此需要通过一系列措施提高地方政府提供公共物品或服务的效率，从而使其满足中央政府需求。Wildasin（1991）还指出，收入分权能够影响政府的总收入动力。因此，他提出了“效率-公平”模型来描述收入分权下各级政府之间的行为差异。而 Pauly（1993）则认为，只有收入出现差异性，各级政府收入存在差距，才能鼓励政府向帕累托最优状态进发。这两个结论都说明收入分权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但这种建立在要素不能自由流动假设基础上的收入分权研究同样具有局限性，对于各级政府的资源配置职能阐释不足。同时，由于地方政府间事权与财权划分不清以及中央政府转移支付制度设计不合理等原因，造成了地区间财力不均等现象，从而进一步加剧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故 Qian 和 Weingast（1997）认为央地政府在资源配置职能上的分工合作，恰恰真实地反映了财政分权问题。

#### 2.1.2 财政分权测度研究综述

财政分权是划分中央与地方权力和支出责任的重要依据，是调整中央与地

方财权关系的制度安排。在很大程度上合理的财政分权制度是资源优化、效率和公平的代名词。政府历来是政治职能执行者、政策提供者，它在财政职能上的不同实施手段，同样是保持市场经济平稳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中央政府逐渐开始向基层转移支付，以解决农村地区公共产品供给问题，这就导致了地方政府间竞争日趋激烈，而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规模越来越大。由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委托—代理问题”的政治治理结构下分工与合作，中央政府会向地方政府下放更大国家权力与支出责任，中央政府会依据结果来监督与刺激地方政府绩效。刘志福（2000）发现，其对经济增长动力的激励与共享有着许多积极经验，还有许多学者对这一正面观点持有不同的态度，如 Davoodi 和 Zou（1998）的发现，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进程中，财政分权发挥负向作用，结合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对财政分权和我国经济增长关系进行再检验，研究发现，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同样存在显著负相关。还有一些学者分析研究表明，二者之间具有非线性关系（林春和孙英杰，2017）。此外，还有一些学者认为财政分权有利于推动经济增长，但不是直接影响，而是通过影响相关因素来影响经济发展，如郭然和梁艳基于财政分权的视角，分析我国省际 2003-2017 年环境规制同经济增长质量间的关系，发现在财政分权程度较低时，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有显著激励作用（郭然和梁艳，2022）还有学者认为分权将带来更大的财政自主权，并提高地方政府的微观管理能力，地方政府可以充分承担转移支付的职能，根据当地情况协调城乡发展的差距（苏春红和李真，2022），但是他们并没有深入到具体的影响机制之中。由此可知，有效合理的财政分权制度对于我国的经济质量的提升有着非同一般的作用。

当前，对财政分权的衡量主要有如下三种，第一类用一个或几个指标单独计量，第二类以梳理推导的方式加以测量，第三类以构造综合指标来构建多维体系加以度量。第一类测度下，学者所使用之指标如下：用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比重为基础测算财政收入分权指标（Akai 和 Sakata，2002；何德旭和苗文龙，2016；田红宇等，2019），根据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比重测算的财政支出分权指标（吕勇斌等，2020；谢辉，2022），根据地方政府自有收入与支出的比例，测算财政自主度的分权指标（林春，2017；江红莉和蒋鹏程，2019），也有以地方财政预算收入占实际生产总值比重作为财政分权水平的度量指标（曾夏锐，2022）。

第二类测度下，徐永胜和乔宝云（2012）使用支出（或收入）所占份额的数据，构造了一个能够对财政分权的度量进行公理化推导的模型。后来，朱长存和胡家勇（2017）计算了包含收入、支出和决定权财政分权衡量和加权。第三类测度下，孙开和温馨（2014）分别从经济性分权与行政性分权的视角进行了包括体制性分权在内的选择、协议性分权和增长性分权等 6 项指标采用加权法度量财政分权指标。储德银等（2018）采用地方政府预算内收入的比重、预算外收入的份额、预算内支出占比和预算外支出占比等 7 个指标采用加权求和法、加权乘法法和加权重置理想法衡量财政分权指标。汤旖璆和施洁（2019）采用加权乘法法，将收入分权与支出分权指标加权测度测财政分权指标。

## 2.2 高质量发展研究综述

### 2.2.1 高质量发展内涵研究综述

黄河横贯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等地、山东九个省区，纵贯全国东中西三个地带，在整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格局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习近平总书记 2019 年 9 月在郑州明确提出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任务。

经济高质量是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在南北经济分化背景下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自 2017 年提出高质量发展以来，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一大批学者分别从不同的视角阐述了它的内涵，但至今仍未得出统一结论。随着人口增长、工业化城镇化深入推进，对自然资源需求不断增加，生态环境面临较大压力，已成为影响区域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所以在不同学科不同角度都有很多学者做出许多创新思想研究。就政治经济学而言，一方面，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就是要化解生产力内部要素矛盾，大力发展生产力，另一方面，又要通过深化改革来调整生产关系，使之与生产力发展相统一（丘艳娟，2020）。从理论上讲，经济质量指生产效率、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的综合表现，即经济系统运行过程中所达到的状态或水平。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宋国恺（2018）的研究发现，经济高质量就是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结构升级，社会基础主要有就业，教育和收入分配等方面，应加强

社会流动机制建设等等。经济高质量发展主要指经济社会整体上呈现一种更高水平的状态。宏观，中观和微观视角，就是反映到宏观经济上、行业上、企业的三个层次，即足够、平衡地发展就是要蕴含发展方式、发展成果与民生共享等多维度的成长与提升（袁晓玲，2019；孙祁祥，2020）。因此，这一研究成果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在“五个新发展理念”的视野下，经济高质量发展要体现创新是第一动力，协调作为内生性特征，绿色是日常形态，开放是必由之路，以共享为根本目的，进而开展工作（杨伟民，2018）。因此，可以说这一新的理论框架为我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思路。同时，由于五大新发展理念在新时代具有广泛的内涵，这一视角也就成了更多数学者研究经济高质量发展问题的依据。

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可拓展发散很多方面。安树伟、李瑞鹏（2020）认为，黄河流域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就必须进行严格的生态综合治理，强化区域分工，促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科技创新能力。施涛（2020）认为，科技创新促进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多元化的资本投入有待强化，改善人才环境。王军（2020）提出，运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建设立足于黄河流域的资源现状、社会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水资源管控体系等，助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苏华等（2020）发现，人力资本与基础要素的集聚助力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冯波、郭巍（2022）强调，必须通过健全顶层规划、优化产业布局等、强化创新投入，促进黄河流域制造业向高质量方向发展。金凤君（2020）研究方向是产业发展对黄河流域生态环境的影响，学者建议处理好流域环境承载力和产业布局的关系，然后推动高质量发展。朱永明等（2021）认为，黄河流域实现高质量发展，它是以保持生态平衡为前提，大力发展经济，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有机结合，倍增。领域能良好地协调与发展。郝金连等人（2022）则侧重于通过城市群合作模式更有效地实现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温玉钊、李小建和刘帅斌（2021）认为，发挥比较优势，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有必要以流域内外经济关系为视角审视黄河流域开发问题。流域开发开放的模式、流域产业体系的建立和流域内部的协作优化，重塑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选择。

## 2.2.2 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测度研究综述

在大力扶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前提下，学界对高质量发展水平，粗略地形成广义与狭义两个不同层次的理解，在这一基础之上，还各自发展出两种不同衡量方法，也就是采用单一指标衡量与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两种测度方法。在单一指标衡量方法中，大部分学者选取了全要素生产率这一指标，还有部分学者选取了劳动生产率等指标，如贺晓宇和沈坤荣（2018）指出，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高质量发展关键；陈晨、刘冠军（2019）指出，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其根本出路在于提高劳动生产率与全要素生产率，经济发展已经从加大要素投入转向了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郭新茹和陈天宇（2021）将全要素生产率作为衡量高质量发展的指标，研究文化产业集聚。另一类测度方法为综合指数法，通过多维度指标体系的建构，然后测算高质量发展水平。周永道，孟宪超等、喻志强（2018）基于“五位一体”的观点构建区域综合发展评价体系屈小娥，刘柳（2021）把能反映经济发展运行效率的有关指标反映到“协调”二级指标之下，最后，构建了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评价体系，该体系包括五个二级指标和18个基础指标。

众学者在结合了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建立了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评价体系。师博、何璐、张文明（2021）采用由熵值法和均等赋权构成的组合赋权，基于发展的基本面、社会成果和生态成果三个维度，测度 2004—2017 年黄河流域 77 个地级以上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李福柱、苗青（2022）从生态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两个层面，环境压力、环境保护、动力变革、效率变革和质量变革五个维度构建了包含 33 个指标的黄河流域城市生态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任保平、付雅梅、杨羽宸（2022）从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和安全发展六维度构建评价体系，采用熵权 TOPSIS 法客观赋权，评价了 2010—2018 年黄河流域九省区及各主体功能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状态。

## 2.3 财政分权对高质量发展影响的研究综述

### 2.3.1 财政分权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积极经济影响

众多文献研究表明，财政分权可以正向促进经济增长。Bird（1993）提出，地方政府财力越雄厚，对于公共部门来说是高效的，最终促进了地方经济的积极发展。Iimi（2005）分析了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所提供的信息和研究结果，分析财政政策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Gemmell N（2013）和其他关于财政分权的研究，它的角度是由支出和收入组成的。研究发现，支出分权导致经济的低增长，而收入分权通常又与高经济增长相挂钩，从而降低支出分权。因此，我国实行“分税制”改革后，财政收入占比提高，而财政支出比重下降，从而促进了经济增长。Lin等（2000）立足于中国的实际，研究发现，中国式的税收分权可以显著促进经济增长。本文基于这一理论框架，通过分析地方政府的行为来验证这一点。在中国特色的分权机制下，地方政府对地方经济发展有很强的推动作用（谢振发、张伟，2015）。地方政府是地方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他们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从事经济活动，促进经济发展。从微观角度看，财政支农对促进农业技术创新有着正向的调节作用（乔翠霞、刘韵致和杨晨曦，2023），财政分权的程度会影响政府对农业的支持力度。在此背景下，如何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来实现中央和地方之间的财政关系协调以及促进经济增长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很明显，已经开展了富有成果的分税制改革，对于提高当前阶段我国经济发展质量尤为重要。

同时从宏观视角上来看，财政分权能够对地方总体经济增长水平产生影响，詹新宇、韩雪君等（2018）对以“五大发展理念等”为衡量指标的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质量指标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财政分权整体有助于推动经济增长质量水平提升。侯世英和宋良荣（2020）认为，在现有经济环境下，财政分权主要通过社会服务性供给对经济质量产生作用，财政分权对于人们生活质量的改善、生态环保质量改善等成效显著。总之分权程度高，地方政府财政收入能力越强，因此，对设施建设水平的提升贡献愈大，公共产品的效率越高，还可通过产业政策等方式对微观企业投资和生产活动产生影响，继而推动

经济高速增长和质量提升。

### 2.3.2 财政分权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消极经济影响

经济发展质量一方面体现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另一方面体现在通过技术进步提高生产效率（何晓宇、沈坤荣，2018）。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增速减缓，人口红利加上传统资源优势正在逐步弱化，科技已经成了经济长远发展新动能。如何提升我国经济发展质量，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成为热点。当前许多学者研究财政分权水平如何影响技术创新，认为财政分权会使地方政府产生无助于经济增长质量改善的“短视”性投资行为。

传统理论分析表明，地方官员的“提拔赛”使得地方政府更注重回报快的生产性投资，而相对忽视有长期效益的创新性投资。Zhang 和 Zou（1998）抽取了 1978 年至 1992 年中国各省的数据来研究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发现两者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周立安（2007）认为，政府官员受到晋升赛影响加之自由裁量权较大，让地方官员产生了为尽最大努力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却又让官员们对行政问题多了几分重视。这些都使得地方政府对经济活动进行过度干预。绩效也会带来忽视治理等长期后果。Luo 和 Chen（2010）在他们的研究中发现，中国式财政分权促使地方政府集中于基础设施建设等财政支出，而比较忽略了教育和其他公共服务供给。这些结果被解释为晋升赛会激励地方官员对短期利益的追求以及忽略对长期效益的考虑。地方当局在中国式分权中的利己偏好造成了一种“短视”现象，这种现象会影响特定系统的长期运行和经济发展。

### 2.3.3 财政分权对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财政分权在大部分文献中都主要针对的是全国或者长江流域，关于研究黄河流域的很少，以前的文献也存在时效性的问题，故而在此主要阅读了一篇财政分权影响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文章。张瑞、王格宜和孙夏令（2020）认为财政收入分权与财政支出分权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不统一。财政支出分权显著推动了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并对财政收入分权产生了抑制作

用。财政分权通过抑制技术进步，显著抑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财政支出分权通过提高政府支出效率从而降低了技术进步率。财政支出分权正向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且这种正向促进作用主要来源于技术进步效应。

## 2.4 文献述评

基于对上述文献的回顾和梳理，我们发现有关财政分权、高质量发展以及财政分权与高质量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相当丰富，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第一，在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测度中。目前已有学者已经提出了一系列关于高质量发展的度量指标。已有文献多针对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进行建构，它的测算方法比较单一，以层次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和熵值法等。这些指标都能反映出不同地区的经济社会质量情况，能够较好地反应区域经济发展的现状。但构建指标体系主观性强，模糊变量的经济意义等不足，可能对评价结果得出不确定的结论。本文试图通过最大化消除主观性设置指标权重的影响来提高科学性，从而使之更具有说服力。第二，已有很多文献讨论了财政分权和经济增长质量问题，但是主要研究的是财政分权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某一方面之间的联系，几乎没有学者把眼光投向黄河流域，系统而深入地探讨了财政分权和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相互关系。在中国高质量发展进程中，黄河经济带和中心城市群蓬勃发展，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成为经济和城市发展的热点，讨论财政分权和经济高质量发展中某一个层面的效应，只应该是财政分权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部分内容，没有很好地解释财政分权在整个经济高质量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故应更加重视财政分权在黄河流域经济特别是在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及具体通过哪些传播途径影响黄河流域的农业高质量发展。鉴于此，本论文做了一些改进，希望能对以后黄河流域经济发展在农业方面的研究文章有所帮助。

### 3 相关理论

#### 3.1 财政分权相关理论

##### 3.1.1 第一代财政分权理论

第一代财政分权理论的典型学者有 Tiebout、Oates、Musgrave、Stiglitz 等。Tiebout 提出著名的“用脚投票”理论。该理论认为，所有居民是完全自由的，掌握的地区信息也是完全的，每个居民不受束缚，可以在地区间自主流动迁移，那么各地区所能够提供的公共物品和服务就会成为吸引居民的重要指标，其质量的好坏会直接影响居民的效用，根据理性人假设，居民最终都会选择搬到实现自己效用最大化的那个地区。为了吸引居民入住生活，各地方政府会努力提供较为优质的物品和服务，制定合理且优惠的税收政策，这就会产生各地区间的竞争关系，在不断竞争中达成最后的均衡。Oates 在《财政联邦主义》这本书中提出财政分权定理，即如果对于某种公共物品来说，其消费关系到所有地域的所有人口的子集，并且能够等量地进行合理配置，且对中央政府或者地方政府而言，提供该公共物品的成本都是相同的，那么地方政府是可以做到比中央政府更有效地提供该公共物品给地方的居民，还能实现帕累托最优状态。Stiglitz 指出，虽然地方政府更能反映当地居民的偏好，但应强调中央政府的作用，中央政府对地区间公共产品的提供作出统筹安排更有意义。Musgrave 认为地方政府也应该保有一定支配税收的权利，不同税种应该由中央政府剥离分开，设置中央和地方各自的征税范围，中央政府保留调节宏观环境的税种，各地方政府则依据责任范围设定征税内容。

##### 3.1.2 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

第一代财政分权理论认为，经济学家更多的是把政府看作公共利益的保护者，并且经过理论迭代，二代财政分权理论将政府官员视为理性人，他们选择寻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没有对社会公共物品效用最大化进行无条件保护，因此，它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府行为模式方面。Qian 与 Weingast（1997）侧重于

中央与地方政府分工机制，借助于新厂商理论分析，推断有效分权结构应在政府官员与地区居民之间达到福利相容。两位经济学家注意到，由于缺乏对公共品供给过程中外部性问题的认识，地方政府往往以牺牲私人部门的整体效益为代价来获得个人利益的提高。地方政府总是会在机制不健全时钻漏洞，出现寻租等腐败行为，继而使得公共产品低效化。由于地方政府存在着自利性动机，其决策会偏离最优解，产生激励扭曲现象。另外财政分权也会引起地方自治的竞争。因此，地方政府间的竞争可能会通过影响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而产生负面影响。在竞争过度的情况下，它所产生的增长效应通常并不能抵消它所造成的削弱效应，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因此，为了促进地方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必须通过建立有效的财政分权体制来抑制地方政府的竞争行为，使之与中央政府形成良性互动。当这样的竞争变成了对“市场”的保护，地方政府还要负起自己的责权利，加大财政预算硬约束力度。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认为，财政分权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地方政府间的竞争，各政府间出现“攀比行为”，从而形成约束和激励机制，然后从某种程度上把控地方政府的经济干预水平。若某地方政府对所辖企业生产决策干预过多，而另一些区域采用市场化竞争战略，将使所辖企业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因而降低了财政收入，破坏了所辖区域要素配置。因此，在进行区域划分的基础之上，建立起一套有效的激励制度来促进当地居民参与到本地市场中去，以达到优化资源配置的目的。在有足够的激励，却缺乏足够的约束的情况下，这样就会使公共支出结构失真。尽管地方政府对地方公共产品的供给是最有效率的，但是存在地方政府利用过度的问题、公共产品滥用浪费等问题，最终对经济发展不利。因此，地方政府必须根据当地经济社会状况来制定合理的财政支出政策，以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

### 3.1.3 中国式财政分权理论

傅勇和张晏（2007）提出“中国式财政分权”概念，他指出“中国式财政分权”的核心是经济分权和政治垂直管理体系并不矛盾且共同存在。它不同于西方的财政分权体制，有其独到之处。一是，“中国式财政分权”属于“行政性一致同意”型财政分权模式（马万里，2015）。中国的财税体制改革离不开中央政府这根主心骨，多项重大改革方案的出台属于布坎南行政层面决策方式，即

“行政共识”财政模式，这也决定了中国财政分权的“行政共识”财政分权模式。二是在中央政治集权内部实行中国式财政分权。由于我国特殊的政治体制和文化传统，地方政府具有强烈的政治权力意识，因此其对上级政府的监督主要靠官员自身来实现。在西方国家，任命官员是通过管辖范围内选民“用脚投票”这一机制来确定，堪称“问责到底”。中国政府官员之任用，系中央政府以人事任免方式确定之，堪称“自上而下负责”。“自上而下负责”是政治集权的表现，所以中国式财政分权就是集政治集权和经济分权于一体的分权体制。由于中央政府对地方的直接控制和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利益冲突，使得中央无法实现对整个国家的有效管理，从而产生了所谓“人治的专制”现象。在中国型财政分权体制中，一直以来都是由中央政府来审核任免地方政府的官员，致使地方政府产生了较强的“政治较量”的动力。这种“政治较量”激发了地方政府对中央政策的执行力度，从而推动了财政分权体制的形成。经济分权还为地方政府提供了部分经济自主权，这促使地方政府中的理性经济人努力追求利益最大化，二者互动，大大带动当地经济发展。从我国的现实来看，这种经济分权体制有利于提高中央对区域经济的控制力。因为文化环境和政治体系的不同，西方向来以“自下而上”的财政体制改革制度为其代表特征，但在我国，由于历史上政治体制一直为统一的状态，地方政府不会越级脱离中央政府管控，财政体制改革的过程，就是一个“自上而下”强制性制度变迁的过程，它还反映在历次分税制改革政策上，地方政府在既定财税体系下，经过博弈与竞争，使自身利益达到最大限度。

这一部分通过第一代的、第二代与中国式财政分权理论探析，厘清地方政府在不同财政分权理论中的行为差异，和潜在经济效应，为随后对财政分权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关系研究提供有效理论支持。

## 3.2 经济增长相关理论

### 3.2.1 马克思主义经济增长理论

亚当·斯密在他的《国富论》一书中，把经济增长和国民财富的增加作为一个主题。首先，以微观经济学理论为基础，分析资本是如何形成和积累的，

进而深入考察欧洲经济增长的过程和政府在其中作用。他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也是劳动分工理论，这被认为是研究劳动生产效率提高进而经济增长的重要方法。分工在国民财富创造中的重要作用，主要表现在减少了产品生产整体的劳动时间，避免了不分工方式造成的效率损失，提高了生产效率。生产效率。资本积累理论是分工理论中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先决条件 亚当·斯密指出，随着资本家以购买生产资料的形式将资本投入生产过程，这就带来了分工和生产的可能性。进一步的分工带来效率，也带来国民财富的增加。李嘉图也认同亚当·斯密对于经济增长的观点，同时对新观点进行了解释。他认为，社会财富的增加即经济增长，可以通过增加生产性劳动量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实现，其作用是通过增加投入和调整要素组合来实现的。综上可以得出结论，劳动力、资本、土地和技术进步等因素是维持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而在马尔萨斯的理论模型中，人口增长是内生的。他提出，人口数量在社会发展初期不断增加，经济也随着人口红利的出现不断提速增长。但是随着人口增加值到达一定程度，土地和生产资源利用率达到顶峰，继续增加人口无法满足这部分的需求，就会出现死亡率上升和出生率下降的情况，直到出现零出生率和零经济增长率的均衡状态。

马克思第一次提出了对经济增长进行长期、动态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全新的、具有创新意义的经济增长模式。他认为：“劳动生产率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以及自然条件。”马克思描画了社会资本再生产与价值循环的理论框架来解释经济增长，他指出资本、劳动力、创新技术和制度是每个国家经济发展提升质量的关键，分析统计这几个角度可以了解是否经济能够得到长远发展。

马克思的发展理论既反映出资本主义体系的缺陷与不合理之处，也反映出仅仅关注经济增速是非常态化发展方式。社会体制、经济结构必须随着经济发展而改变。经济增长为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了大量的物质资源，但是同时，随着经济利益的提高，也产生了许多问题，如环境污染、人民福祉下降等，而这些都是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因此，低质量的经济增长，必须要对经济和社会的每一个方面进行全面、系统的关注，才可以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整体质量，从而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 3.2.2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

在工业革命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内，市场经济迅速发展完善，在经济学界也随之出现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主要包括效用理论和分配理论等，并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其主要代表人物是 Solow（1957），他指出工业革命使得劳动力产出显著提高，这时候物质资本的积累就不能以人均产出来简单衡量，人均产出膨胀速度极快，物质资本无法表现出它的增长，也不能说明产出间的地区差异。这一结论使人们认识到经济增长并非完全依赖于物质资本积累。在此基础上，许多学者提出了“内生增长论”，认为技术进步是一种由企业自发进行的生产过程。这种观点被后来一些经济学者接受并加以推广，他们将这种观点称之为“内生增长”。但这种观点并未获得主流经济学家的支持，甚至遭到反对，这就使人们开始怀疑“内生增长论”是否正确？从而引起研究者对于技术发展问题的深入思考，也促进出现了新的增长理论。技术进步是由一系列知识积累和运用所推动的，而这些知识往往是不确定的或未知的。Arrow（1962）指出，有些知识是通过进行传统经济活动时收集到的，并非自主学习，技术的发展就是主动或被动学习的结果，存在于常规性学习和经济活动中。1986年，罗默更新了边做边学模型，解决了模型中外部性与竞争均衡的相容性和经济增长的异常问题，并得出结论：知识与技术与研究开发是经济增长之源。经济可以长期增长，平衡增长路径是稳定的，因此，内生信息积累理论成为研究持续稳定增长的基础之一。Kremer（1993）发现，基本上所有知识的内生增长模型都预测技术进步是人口规模的递增函数，而技术进步主要导致人口增长。除了技术进步之外，相关学者研究发现，制度能够做到激励和调节市场经济活动，发挥市场价格无法达到的作用。因而制度也是市场经济增长的一大内生动力。

### 3.2.3 政府与市场关系理论

关于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历来就有争论。由于各国市场发展水平和政府进入市场的立场不同，政府和市场之间也存在着不同关系。亚当·斯密提倡自由竞争，在政府中扮演“看门狗”角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提倡的是国家计划，不是市场，凯恩斯主义提倡国家干预，杜绝市场失灵，新自由主义倡导市

场的回归、有限政府与一体化。政府干预经济多由市场失灵引起，以及市场失灵的立法等、行政管理，直接参与经济活动进行补救。但是，政府并非解决一切难题的灵丹妙药，就有失败的危险。在政治学，行政学视野下，需要政府，特别是公共产品的供给与公共行政的发展，政府能够更快地、更加高效地回应了当地民众的诉求。尽管有失败的危险，但是，我们不应该放弃政府，单纯依靠市场，同样存在着风险，其盲目滞后，将使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蒙受巨大损失。政府干预理论是在深刻认识市场失灵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市场机制理论是以洞察市场的作用为基础的。人类的经验表明，“无形的双手”并非无所不能，政府干预一定会失败。逻辑上的必要性看来在于，二者应确立一定的分工，修正对方的过失。由于市场逻辑和政府干预并不冲突，市场逻辑并不以无政府主义为中心，理清二者关系，事实上，它是对政府职能范围的定义。基于许多发展中经济体加快赶超的现实需求，发展经济学理论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迅速兴起。发展型政府是指以发展经济学为基础，指导甚至直接替代市场进行资源配置，加速结构变革和增长收敛的政府行为理论和政治制度。与规制政府一致，市场失灵也是发展性政府干预的理论基础。不同的是，发展政府认为，早期经济体尤其是基于结构主义的理解，在要素流动、投资调整等领域面临着显著的“结构刚性”，广泛存在各种复杂的市场失灵和市场缺位，因此需要外部干预来克服结构性障碍，也说明发展型政府的经济干预对于支持结构性变化和促进追赶性增长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市场竞争机制在资源配置中是行之有效的，但是，资源配置并不完全是经济问题。现代经济学所剖析的“经济”，就是一个矢量过程——从生产要素的配置、生产、消费者偏好的满足到市场出清意味着经济过程的结束。实体经济是一个反复再生产的循环过程，需要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再生产的可持续循环。在从分配到再生产的关键环节，一个竞争性的、以效率为导向的市场机制可以让生产的各种参与者在边际生产力的规则下得到充分的回报。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为框架，提出了赋能型政府理论，构建新一代的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分析框架。赋能型政府的根本特征在于经济的可持续是循环扩张的过程，而不是向量过程，以经济参与者动态能力积累和分布为分析出发点，以非价格扭曲的方式、非有偏选择介入模式，为企业或者个人参与市场竞争提

供要素赋能、创新赋能与信息赋能等，跳脱出政府行为所面对的信息约束与俘获困境，提升市场主体资源配置和人力资本代际更新能力，推动兼容效率机制中的分配优化，实现跨期福利最大化的前提下，取得了较快的技术进步和发展，达到经济可持续循环扩张的目的。

### 3.3 财政分权影响经济增长机理

#### 3.3.1 直接效应

通过收入分权，地方政府能够对其中的一些收入进行自由的运用，由此，地方政府对地方经济发展的内部动力得以激发，与此同时，它也可以刺激地方政府官员把重点放在改善和开发工业有关基础设施方面，以实现 GDP 增长，也可以给地方提供更优质的社会公共服务，这些服务可以改善辖区内居民生活质量。因此，在我国目前阶段，地方政府仍然是推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主要力量之一，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地区的未来发展前景。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财政收入水平也在不断提高，鼓励支持各地涌现出一大批大型企业集团，它们是当地重要的支柱产业。大企业不断地进行技术创新，在开发新业态的同时，他们还有足够的资金，完善软硬件设备，为高新技术企业及人才引进营造良好社会环境。通过这些措施，不仅有效地带动了地方经济的快速健康增长，而且还促进了技术成果的产业化应用。由此构成一个很好的循环体系，使得发展环境不断改善，让地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不断增强。

确立地方政府在其职责范围内的主体责任，将部分事权和支出责任下放给地方政府，将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财政支出效率。一方面有利于当地政府收集地区经济发展信息和居民收入情况，信息具有时效性和直接性，便于政府及时出台政策和制定有关规章制度，资源配置也更灵活。另一方面，地方政府所制定的每一个计划和付出的成本都是为了提高当地居民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这将增强地方政府制定经济政策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制定发展计划和资金使用计划，审慎行事。即结合属地资源优势，因地制宜，保障公共产品更加适度供给，增加财政支出支持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中国始终在努力做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而反映出国家的经济自主性的

财政转移支付体系是达到这个目的的重要措施。首先，就中国发展状况而言，由于政府权力分散，造成了我国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严重不足和支出责任过大等问题，因此，必须通过建立一套有效的转移支付体系来弥补这种不足。二是由于各区域之间的发展程度、提供的公共服务有很大的差别，区域之间的发展不均衡将影响整个区域的总体发展。第三，作为一项体制，我国的财政转移支付除了自身的经济性质外，还具备了反映“自顶向下”的政策性质，因此，我国在我国的税制改革中，税收自主程度的高低直接反映了国家对其的控制程度。

政府部门的纵向结构由中央和地方政府构成，财政分权程度取决于中央和地方政府对公共资源的控制权和支出责任的大小。财政分权通过改变政府集中资源在各级政府部门的配置，影响政府部门的生产率，影响政府部门的绩效。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如果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整体绩效降低，必然会导致社会整体绩效的降低。从理论上讲，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存在一个最佳的财政分权程度，以实现公共部门产出的最大化，而偏离最佳分权程度会导致资源配置效率的降低，从而导致社会整体产出的减少，并影响到经济。然而，财政分权的最佳程度可能因经济发展和市场的不同阶段而不同，即不同发展阶段的财政分权最优程度不同。

### 3.3.2 间接效应

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影响的间接效应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财政分权会对私营部门产生影响，私营部门的选择会随着分权程度的不同带来的市场竞争程度而改变；另一方面是通过影响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的发展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财政分权通过影响各级政府的行为选择和改变私营部门面临的外部环境影响私营部门的决策来影响经济增长。一方面，财政分权会造成政府间的竞争，既包括各级政府之间的纵向竞争，也包括同级政府之间的横向竞争。这种竞争可以是良性竞争，从而提高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促进市场营销和制度创新的进程，也可以导致政府间的激烈竞争，造成市场重复建设和分割，也可以影响政府监管和政策协调。另一方面，政府通过金融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政府通过金融履行的职能是市场的必要附属物。政府的行为选择将对私人实体的决策产生

重大影响。在不同的分权体制和分权水平下，政府对私营部门行为的选择会发生变化，因此私营部门的决策行为也会发生变化。

此外，财政分权可以通过鼓励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的发展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人力资本在高质量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人力资本能够提升单位资源生产率，尤其是人力资本的增加，将使劳动力整体素质得到提升，从而改进了先进生产。同时人力资本又能通过对物质资本的替代效应降低企业成本，使其效率得到提升。另一方面，人力资本可以增加投资的吸引力，人才引进是为了更好地吸引大型企业入驻地方，提高企业的投资力度，进而实现与企业间的互惠，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财政政策分权之所以会对技术创新产生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政府主观能动性。财政分权通过激励企业研发投入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并促使其更多地向高科技领域转移。假定生产要素能在市场中自由地流动，劳动力和资本都会优先流到技术附加值高的企业，而不会选择无附加值的公司，这就是技术创新所决定的内容，而技术创新主动性将提高科技创新。二是国家扶持。分税制的出发点就是各级地方政府通过各自地区的发展调整税收优惠和技术创新普惠政策。技术创新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可以通过加大技术创新投入来改善公有制经济支出结构，促进地区间的交流，实现良性竞争，由此促进国内经济循环。

综上，从理论上可以看出，财政分权对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并不是可以被直接判定的，而是具有两种截然对立的影响，最后的总体影响是由两种因素的相互影响而决定的。这种潮起潮落主要表现为财政分权程度的变化。财政分权程度低时，对区域的支撑效应要比对区域的约束效应更强，因此，从整体上看，财政权力下放能够提高区域的发展水平；相反，在较高的层次上，财政分权的约束效应要比支撑效应更强，因此，从整体上看，财政分权的约束效应对高质量的约束效应是显著的。因而，我国的财政体制改革呈现出一种“倒“U”形效应”，即对我国的高质量发展先是对其有利，继而对其产生了一定的制约。财政分权对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如图 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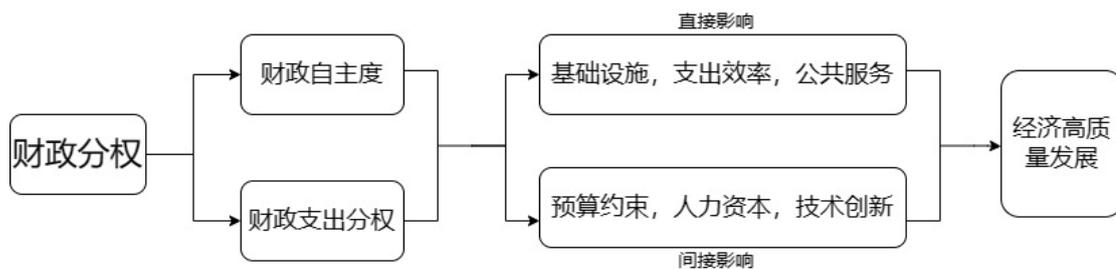


图 3.1 财政分权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机制示意图

## 4 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与财政分权水平测度

### 4.1 黄河流域农业经济发展水平测度

#### 4.1.1 超效率 DEA 模型建立

数据包络方法（DEA）最早由美国运筹学家 A.Charnes 提出，CCR 模型是 DEA 的基本模型，通过各决策单元（DMU）的投入要素和产出要素，利用线性规划的方法，构建最优投入或最优产出作为最优前沿面，通过各决策单元的相互比较，计算各点到最优前沿面的离差，从而对各决策单元的效率水平进行测度。超效率 DEA 模型由 CCR 模型扩展而来，CCR 模型（4.1）及超效率 DEA 模型（4.2）的数学形式如下：

$$\left\{ \begin{array}{l} \min \theta \\ s.t. \sum_{j=1}^n \lambda_j X_j + s^- \leq \theta X_k \\ \sum_{j=1}^n \lambda_j Y_j - s^+ \geq Y_k \\ \lambda_j \geq 0, s^- \geq 0, s^+ \geq 0, j = 1, 2, \dots, n \end{array} \right. \quad (4.1)$$

$$\left\{ \begin{array}{l} \min \theta \\ s.t. \sum_{j=1, j \neq k}^n \lambda_j X_j + s^- \leq \theta X_k \\ \sum_{j=1, j \neq k}^n \lambda_j Y_j - s^+ \geq Y_k \\ \lambda_j \geq 0, s^- \geq 0, s^+ \geq 0, j = 1, 2, \dots, n \end{array} \right. \quad (4.2)$$

#### 4.1.2 变量选取及数据收集

舒尔茨认为，在我国传统的农业中，引进新型的、以新型的、具有较强生命力的、以其为主要动力的新型的、新型的、可持续的、有价值的、有竞争力的、有较大潜力的、有潜力的、具有可持续发展潜力的新的、新的产业结构，是实现传统农业转变的前提和前提。但是很可惜，舒尔茨并未明确指出，什么

科技元素能够整合成新的科技元素，又是怎样形成的。作为一个 13 亿多人的新兴国家，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既关乎着中国人民的生计，又关乎着整个世界的安定与协调，更关乎着中国的未来。以“中国梦”为主要目标的战略性行业。约翰逊和理查德（1997）认为，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农业生产力的提升对其经济价值的提升至关重要。我国的农业生产率不断提高，既是我国农村人口重新分布的前提，也是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一项重要资源，同时也是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十八大中，“加速发展现代农业，提高农业生产的整体水平，确保我国的粮食生产和重要农产品的有效供应”，是引进现代农业、实现农业生产的一项关键措施。我们需要深入理解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成长的实质及变动规律，并在不同的土地利用方式下，寻求对农业现代化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

本文选择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作为高质量发展衡量指标，选取数据的时间跨度是 2009-2020 年，农业全要素生产率（TFP）投入变量指标包含：1）劳动投入：以各地区农林牧渔从业人员（Employed Persons: EMP）表示；2）土地投入：使用农作物总播种面积（Sown Area: SOA；单位：千公顷）代替；3）机械动力：以农业机械总动力（Power of Agricultural Machinery: PAM）表示。产出变量选择农林牧渔总产值，以 2000 年为基期计算，进行不变价处理。

数据来源方面，黄河流域分为山西、内蒙古、四川、山东、河南、陕西、甘肃、青海和宁夏回族自治区 9 个省和地区，因为四川仅有两个州属于黄河流域且数据缺失，故研究范围不包括四川省，因此，本文研究的黄河流域分为青海、甘肃、宁夏回族自治区、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和山东八个省区，数据主要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劳动和就业统计年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站、各省(市、自治地方)统计年鉴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 4.1.3 测算结果及说明

本文采用专业版 MaxDEA8.0 软件，基于超效率 DEA 模型，测算黄河流域八省区 2009-2020 年的全要素生产率。表 4.1 为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各省份的测度结果，表 4.2 为基于文献汇集所划分的黄河流域上游地区和中下游地区的农业

全要素生产率数据。

表 4.1 各省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测度结果

	山西	内蒙古	山东	河南	陕西	甘肃	青海	宁夏	平均
2009	51.6	95.7	96.6	96.2	98.6	67.2	52.7	77.6	79.5
2010	50.0	96.1	97.7	96.2	99.2	56.6	54.0	77.7	78.4
2011	50.7	97.8	97.1	95.4	93.6	76.7	55.1	77.9	80.5
2012	51.3	98.5	96.1	88.0	98.8	75.0	55.2	77.7	80.1
2013	50.8	93.8	98.0	95.7	99.8	72.2	52.9	64.6	78.5
2014	49.9	77.4	98.1	97.1	96.7	73.1	47.2	65.6	75.6
2015	41.9	84.5	98.4	97.9	99.0	57.2	47.7	67.3	74.2
2016	68.1	82.2	100.0	97.9	67.7	57.2	62.7	59.6	74.4
2017	84.6	79.7	97.6	102.1	66.9	57.9	63.1	77.6	78.7
2018	80.7	76.5	90.2	100.6	67.7	59.1	64.6	77.7	77.1
2019	76.6	98.9	91.6	100.1	67.4	61.4	65.6	77.9	79.9
2020	100.7	98.7	96.7	99.5	67.8	65.7	67.3	77.7	84.3
平均	63.1	90.0	96.5	97.2	85.3	64.9	57.3	73.2	

表 4.2 分组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值

地区	2020 年组内平均全要素生产率	历年均值的组内平均全要素生产率
上游	0.774	0.706
中下游	0.912	0.856

从表 4.1 可以看出，2009-2020 年间，黄河流域八省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呈波动式发展。2008 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全球经济同样遭受了很大的冲击，我国的经济也由此发生了急剧的滑坡。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及时出台应急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双管齐下，并实施“四万亿”投资计划来拉动内需，促进增长，用来规避经济急速下滑造成的全国经济动荡和危机。在此过程中，我国政府积极调整宏观政策取向，陆续落实优惠政策，加大市场管控力度，采取一系列措施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转变增长方式、提高创新能力。2012 年国际国内发展形势更加严峻，世界经济有继续下滑的迹象，以及国内经济正处在结构调整阶段，全要素生产率显著降低。在此背景下，我国消费增速明显下降。为使这一状况得到及时好转，我国已经开始大力发展经济。在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来稳定市场物价，促进经济增长。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旨在改善供给效率，响应需求变化，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从而在 2014 年之后实现开始复苏并稳步增长。2020 年黄河流域的平均农

业全要素生产率为 0.809，历年平均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为 0.781，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适中，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差距较大。2020 年黄河流域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最高的省份为山西省（1.007），且仅有该省份达到了有效率，其他均为无效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排名最末位的省份为青海（0.585），排名第一的是河南省（0.976）。从地区分布层面来分析，参照樊福才对黄河流域上中下游的划分方法，并结合研究范围对黄河流域的上中下游省份进行具体划分，将青海、宁夏、甘肃及内蒙古划为上游区域，陕西、山西、河南、山东划为中下游区域。表 4.2 明显展示出中下游地区的平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要高于上游地区。

## 4.2 财政分权水平测度

### 4.2.1 指标选择

在前文的基础上，本文将财政分权的相关测度指标大致分为两类，分别从收入和支出角度进行测度。由于财政分权计量的准确性非常重要，并且通过计量两个指标得出的实证结论是科学的，本文将从收入和支出两个角度衡量财政分权指标。财政收入分权有两种性质：第一，“收”的本质。财政收入的分权程度高，地方政府对财政收入自主权越大。从直观角度讲，它是指地方政府有更多的物力、财力，调动并分配所辖地区资源，能为辖区经济发展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直接参与社会经济建设直接带动 GDP 的增长，另一方面，在吸引社会资本，发展辖区经济等方面也产生了明显副作用。经济发展和资源配置，其二是它“放权”的实质。财政收入分权，其核心在于税收收入在不同政府之间的配置，也就是各级地方自治单位的收入占税收总额这块“蛋糕”的比重，表现为财政激励地方政府成长。地方政府也许会感兴趣地把社会资本导向税收较多的产业，或者是那些为地方税收做出巨大贡献的产业，而房地产行业作为地方税源主要来源，也是如此。与此同时，房地产业的迅猛发展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拉动相关行业的进步，进一步助力经济增长，所以很受地方政府欢迎。制造业它的税收收益基本上来源于增值税，属共享税范畴，所以地方政府财政激励比较少。与此同时，地方政府也带来了一些政治成本，以金融竞争的方式吸引企业入驻，致使地方政府对工业化扶持热情比较低。

根据收入分权的界定，本文选择抽取财政自主度也就是地方收入自给率，支出分权按照现有文献的界定计算。具体指标定义：一是用地方政府收入自给率来衡量自有收入角度下的财政分权指标 ( $FD_1$ )，即

$$\text{地方收入自给率} = \frac{\text{各地区本级自有财政收入}}{(\text{该地区自有财政收入} + \text{中央转移支付})} \quad (4.3)$$

二是用财政支出地方人均消费度来作为支出角度下的财政分权指标 ( $FD_2$ )，即

$$\text{财政支出地方人均消费度} = \frac{\text{地方人均本级财政支出}}{(\text{地方人均本级财政支出} + \text{中央本级人均财政支出})} \quad (4.4)$$

#### 4.2.2 测算结果及说明

图 4.1 和 4.2 为黄河流域各省区财政分权指标平均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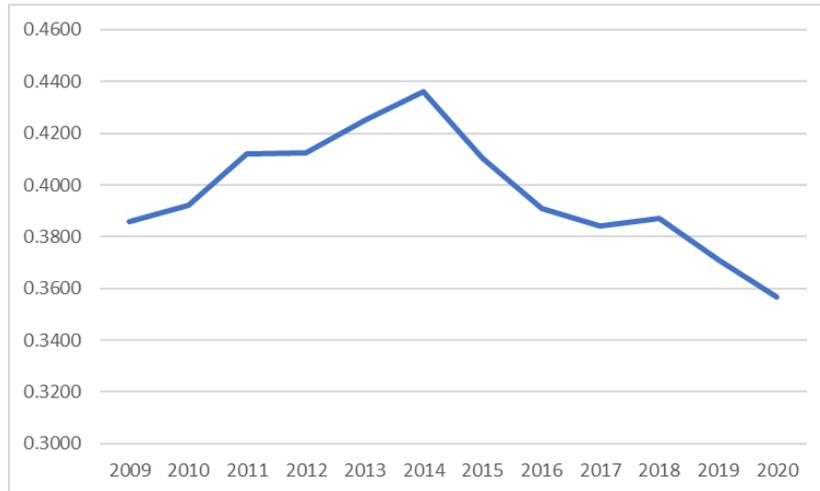


图 4.1 财政分权自主度平均值折线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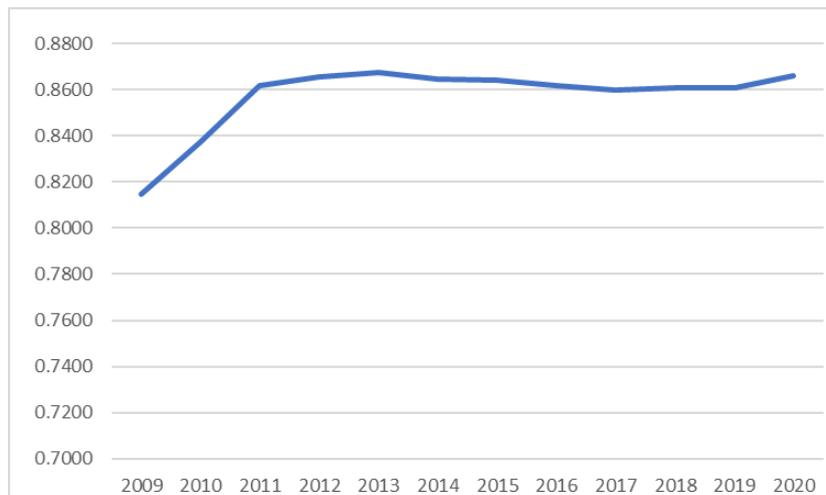


图 4.2 财政分权支出分权平均值折线图

表 4.3 各省份财政自主度

	山西	内蒙古	山东	河南	陕西	甘肃	青海	宁夏
2009	51.6	44.2	67.3	38.8	39.9	23	18	25.8
2010	50.2	47.1	66.3	40.4	43.2	24.1	14.8	27.5
2011	51.3	45.4	69.1	40.5	51.2	25.1	15.7	31.2
2012	55	45.3	68.8	40.8	48.2	25.3	16.1	30.5
2013	56.2	46.7	68.2	43.3	47.7	26.3	18.2	33.4
2014	59	47.5	70	45.4	47.7	26.5	18.7	34
2015	48	46.2	67	44.4	47.1	25.1	17.6	32.8
2016	45.4	44.7	66.9	42.3	41.8	25	15.6	30.9
2017	49.7	37.6	65.9	41.5	41.5	24.7	16.1	30.4
2018	53.5	38.5	64.2	40.9	42.3	23.1	16.6	30.8
2019	49.8	40.4	60.8	39.8	40	21.5	15.1	29.5
2020	44.9	38.9	58.4	40.2	38.1	21	15.4	28.3

表 4.4 各省份财政支出分权

	山西	内蒙古	山东	河南	陕西	甘肃	青海	宁夏
2009	46.6	56.3	46.3	30.6	30.6	29.4	36.9	39.9
2010	46.1	57.7	47.5	31.7	31.7	30.4	38.2	43.4
2011	47.2	59.1	48.5	32.4	32.4	31.7	41.3	47.2
2012	50.8	60.4	50.3	34.1	34.1	33.1	44.1	49.2
2013	52.2	61.4	51.5	36.4	36.4	35.2	47.1	51.3
2014	52.4	61.6	52.2	37.7	37.7	36.2	48.3	51.7
2015	48.2	61.7	52.8	38.3	38.3	37.1	48.0	52.2
2016	46.0	61.4	53.1	38.3	38.3	37.5	44.1	51.8
2017	47.9	54.7	51.2	37.4	37.4	35.8	42.0	50.6
2018	51.8	55.8	51.4	38.6	38.6	36.3	43.3	50.3
2019	51.5	57.4	50.5	39.2	39.2	34.9	43.0	48.3
2020	52.9	59.3	52.4	41.7	41.7	37.4	46.2	49.8

从图 4.1 和 4.2 中可以看出，黄河流域沿岸八省份的平均财政自主度在 2014 年达到最高值之后逐渐回落，而支出分权则保持平缓发展，并未有较大的变化幅度。从表 4.3 和 4.4 中可以了解到山东省的财政自主度在流域八省区内是最高的，而内蒙古则是财政支出分权度最为突出的省份。山东省作为沿海省份，经济发展要优于黄河流域其他省份，地方税收较多，有较高的自主度；内蒙古地广人稀，背靠丰富的煤炭资源，因而有较高的财政支出分权度。还能看到，各省的财政自主度和支出分权是波动的，并不是平稳地增长，波动的时间也略有不同，说明各省对于政策的敏感度不同。

现在我国的财政分权体制已经开始延续分税制改革的成功。在这次经济体

制改革中，地方政府支持经济发展的意愿和中央政府对资本的管理能力有了很大提高。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此次税收分配调整主要是为了改善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但并未明确说明如何划分职责。这也导致了我国财政管理的不足，如政府财权相冲突，无谓变动，国家以下政府财政改革深度不够等问题。

## 5 财政分权对黄河流域农业高质量发展影响的实证分析

第四章通过超效率 DEA 模型的构建，对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指数进行测度，研究发现，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明显空间差异性。所以这一章是基于此，通过构造双固定效应空间杜宾模型，探讨财政分权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整体影响，分析了财政分权对黄河流域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有无显著影响，及所产生的效果。

### 5.1 空间回归模型

#### 5.1.1 模型确定及变量选取

在确定使用空间计量模型之前，要先考察数据是否存在空间依赖性，也就是空间自相关性。如果不存在，则使用标准的计量方法即可；如果存在，则可使用空间计量方法。莫兰指数和 Geary 指数是检验空间自相关性的两种主流方法，本文采用莫兰指数来检验变量的空间相关性。

莫兰指数公式如下：

$$I = \frac{\sum_{i=1}^n \sum_{j=1}^n w_{ij} (x_i - \bar{x})(x_j - \bar{x})}{S^2 \sum_{i=1}^n \sum_{j=1}^n w_{ij}} \quad (5.1)$$

其中， $x_i$ 及 $y_i$ 为*i*区域相关变量值， $x_j$ 为*j*区域相关变量值， $S^2$ 为样本的方差， $w_{ij}$ 表示空间权重矩阵(*i, j*)元素的位置关系， $\bar{x}$ 为 $x_i$ 及 $x_j$ 的平均值。Moran' I 取值大于零，表明变量间存在空间正相关性。

使用地理空间权重矩阵，借助 Stata 软件，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全局空间自相关检验的结果如表 5.1。可以从表 5.1 看出，自 2013 年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检验的 P 值至少能够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以前年份也在 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表明考察期间的绝大部分年份，不同地区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经济空间集聚特征，模型适合采用空间计量。说明本文适合采用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作为黄河流域农业高质量发展的代表指标。

表 5.1 农业莫兰指数

year	莫兰值	Z 值	P 值
2009	0.257	1.626	0.052
2010	0.287	1.734	0.041
2011	0.242	1.563	0.059
2012	0.262	1.625	0.052
2013	0.315	1.839	0.033
2014	0.346	1.954	0.025
2015	0.363	2.09	0.018
2016	0.333	2.044	0.02
2017	0.349	2.074	0.019
2018	0.351	1.993	0.023
2019	0.381	2.11	0.017
2020	0.436	2.356	0.009

在通过空间自相关检验后，构建空间杜宾模型（SDM）实证检验两个核心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对被解释变量产生的影响。

核心解释变量：本模型的核心解释变量为财政分权的两个指标。如前所述，财政分权是中央政府下放权力给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具有一定的支配能力。核心解释变量为财政自主度分权（ $FD_1$ ）和财政支出分权（ $FD_2$ ）。

控制变量：金融市场信贷水平  $Fin$ ，将地方信贷余额与全国信贷余额之比作为衡量指标；地区产业结构水平  $Ind$ ，其计算方式为城市第二产业生产总值/地区生产总值；市场化水平  $Mar$ ，具体为预算内财政支出占地方 GDP 比重的负指标；教育水平  $Edu$ ，指标选取为地区每万人教育从业人员数。

通过以上变量的选取，可得出三个空间计量模型的具体表达式，分别为 SAR（5.2）、SEM（5.3）以及 SDM（5.4）：

$$TFP = \rho w(TFP) + \beta_1 FD_1 + \beta_2 FD_2 + \beta_3 Fin + \beta_4 Ind + \beta_5 Edu + \beta_6 Mar + \varepsilon \quad (5.2)$$

$$TFP = \beta_1 FD_1 + \beta_2 FD_2 + \beta_3 Fin + \beta_4 Ind + \beta_5 Edu + \beta_6 Mar + \varepsilon \quad (5.3)$$

$$TFP = \rho w(TFP) + \beta_1 FD_1 + \beta_2 FD_2 + \beta_3 Fin + \beta_4 Ind + \beta_5 Edu + \beta_6 Mar + \mu_1 wFD_1 + \mu_2 wFD_2 + \mu_3 wFin + \mu_4 wInd + \mu_5 wEdu + \mu_6 wMar + \varepsilon \quad (5.4)$$

表达式中， $w$ 为空间邻接矩阵， $w_{ij} = \begin{cases} 1, & i \text{ 与 } j \text{ 相邻} \\ 0, & i \text{ 与 } j \text{ 不相邻} \end{cases}$ ， $i$ 和 $j$ 分别表示空间中两

个不同的单元。

### 5.1.2 模型结果及分析

莫兰指数的结果显示，该方法存在明显的空间误差。接下来，还应通过 LM 检验、豪斯曼检验、LR 检验和 Wald 检验对所构建的空间模型进行验证。首先通过 LM 分析的数据可知，该模型同时具有空间误差和空间滞后效应，所以选择空间杜宾模型（SDM）。然后模型通过 LR 检验和 Wald 检验，表明空间杜宾模型（SDM）的合理性。模型通过 Hausman 检验，表明应当选用固定效应模型而非随机效应模型。在设定时间或空间固定时，两种检验结果都显著，说明具有非常明显的空间（个体）和时间两种方法，应该采用时空双重约束的空间杜宾模型。

回归结果见表 5.1 的列（1）和列（2）。为了降低异方差的影响回归均采用稳健标准误差。列“Main”对应的回归项系数是指地区“A”的解释变量对地区“A”的被解释变量的影响；列“Wx”的回归项系数是指地区“A”的解释变量对相邻地区“B”被解释变量的影响；列“Spatial”对应的是“A”的被解释变量对相邻地区“B”被解释变量的影响；列“Variance”表示个体效应的特异误差。两个财政分权变量均在 5%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表明财政分权对本地区自身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作用显著。财政自主度越高，资源和技术通常就越丰富，在无形之中，地方政府在取得足够财政收入时，也提高了使用这类资源成本。而空间权重矩阵中，两者的效果都不明显，表明财政分权对相邻区域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无显著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但这种促进作用主要来自于省份间的溢出效应。空间效应的分解可以看到，财政支出分权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抑制作用，并通过对该区域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抑制作用。这或许和地方政府的重生产有关、轻创新与投资偏好相关。另外，由于地方政府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存在“搭便车”问题，导致其将更多资源投向了效率较高的部门。由于地方政府存在着自利性动机，其决策会偏离最优解，产生激励扭曲现象。另外财政分权也会引起地方自治的竞争。因此，地方政府间的恶性竞争可能会通过影响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而产生负面影响。在竞争过度的情况下，不利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所以从整体上看财政分权

可以对农业 TFP 产生负向的影响。

Fin 回归结果不显著, 说明黄河流域各地区的金融信贷并不会直接影响本地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 WFin 回归结果显著为正, 表明该地区的信贷水平带动的效应是会溢出到邻近区域的, 而空间效应也显示为间接效应显著。黄河流域各省份的金融信贷基础本就薄弱, 在相关金融政策的引领下对本地区的直接效应和对邻近地区的间接效应都比较明显。

表 5.2 空间模型回归结果

VARIABLES	(1) Main	(2) Wx	(3) Spatial	(4) Variance	(5) Direct	(6) Indirect	(7) Total
<i>FD</i> <sub>1</sub>	18.35*** (4.135)	-5.674 (8.853)			18.62*** (4.269)	-5.385 (8.959)	13.23 (9.926)
<i>FD</i> <sub>2</sub>	-4.283*** (1.149)	-2.999 (2.755)			-4.382*** (1.183)	-3.204 (2.944)	-7.586** (3.729)
<i>Fin</i>	26.97 (16.58)	86.77*** (29.72)			28.73* (16.85)	90.80*** (33.68)	119.5*** (46.05)
<i>Ind</i>	-2.525*** (0.938)	-5.265*** (1.950)			-2.483*** (0.948)	-5.203** (2.082)	-7.686*** (2.723)
<i>Edu</i>	-2.628*** (0.700)	-2.893** (1.454)			-2.666*** (0.679)	-2.984* (1.563)	-5.650*** (1.968)
<i>Mar</i>	-1.691* (0.865)	0.417 (2.148)			-1.684** (0.826)	0.524 (2.170)	-1.159 (2.699)
<i>rho</i>			-0.0178 (0.154)				
sigma2_e				143.9*** (20.77)			
<i>N</i>	96	96	96	96	96	96	96
<i>R</i> <sup>2</sup>	0.204	0.204	0.204	0.204	0.204	0.204	0.204

注: \*、\*\*、\*\*\*分别表示在 0.1 0.05 0.01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下同。

Ind 与 WInd 回归项系数均为负, 表明一个地区第二产业比重对区域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并不有利, 且对其相邻区域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不利。因此, 在我国现阶段应适度降低第一产业比重, 适当增加第二、三产业比重, 以促进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效果分解的结果同样表明, 第二产业占比直接影响、间接效应与总效应均为负值, 显着抑制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从各影响因素来看, 技术

进步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贡献最大。另外第二产业通常对劳动力要求较高。因此，在考虑第二产业增加值对经济增长贡献时，应该把它作为主要因素来考虑。区域内第二产业单位价值较高，常在相邻地区吸引大批劳动力，导致相邻地区劳动力不足，致使发展速度放慢，长期发展水平下降，最后造成资源外流，造成了消极和间接的后果。

Edu 与 WEdu 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地区教育水平的提高会显著抑制该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且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均存在。这可能是由于：一方面是人力资本比较匮乏，并存在集聚现象，某一区域教育水平提高，往往能吸引相邻区域的人才，对相邻区域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不利；另一方面，当一个地区教育水平提升的同时，由于本地经济水平未与教育水平的快速上升而匹配增加，就会造成人才大量外流，从而抑制本地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因此，当这两种作用综合之后，一个地区教育水平的提高对本地区和临近地区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便具有了显著的抑制影响。

Mar 回归结果显著，说明市场化水平会直接影响本地区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而 WMar 不显著，表明市场化水平没有对邻近地区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间接效应。这也从某种程度上说明，相邻区域在市场上的沟通较少，市场化水平无法对交流起到正向作用。

### 5.1.3 稳健性检验

采用替换核心解释变量和加入空间自相关模型与空间误差模型来作进一步的稳健性检验。将地方财政自给率更换为地方财政收入分权 ( $FD_3$ )，即

$$FD_3 = \frac{\text{人均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text{人均中央本级预算收入} + \text{人均地方财政预算收入})} \quad (5.5)$$

稳健性检验结果见表 5.3 及 5.4。可见财政收入分权的回归系数都是显著的正值。说明某一区域财政收入分权对该区域及相邻区域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促进作用。效应分解的结果表明，财政收入分权产生直接影响、间接效应和总体效应显著正向，与回归的基本结果的结论相一致。所以财政收入分权对该区域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促进作用，并且从整体上推动了整个地区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这可能是由于财政收入分权的提升会利于当地政府对农业资金

的管理和利用，主要依靠农业发展的沿黄河各省拥有更好的积极性区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虽然实证结果有些许差异，但无论是使用财政自主度指标还是使用财政收入分权指标，抑或是加入空间自相关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 $\rho$  (rho) 指数均为负值，是支撑财政分权总体负向抑制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结论的，模型整体通过稳健性检验。

## 5.2 异质性检验

黄河流域作为中国的“母亲河”，其流经区域横跨我国的东中西部，各区域的环境、气候以及所形成的经济状况都有所不同。为了使实证结果具有代表性，各区域的分析更为准确，本文选择对不同环境的区域进行异质性分析，将青海、宁夏、甘肃及内蒙古划为上游区域，陕西、山西、河南、山东划为中下游区域，并假定各地区教育水平相近。下表 5.5 及 5.6 分别为上游地区与中下游地区的空间模型回归结果。

表 5.3 稳健性检验 I

VARIABLES	(1) Main	(2) Wx	(3) Spatial	(4) Variance	(5) _Direct	(6) Indirect	(7) Total
<i>FD<sub>3</sub></i>	2.571** (1.054)	5.173** (2.398)			2.462** (1.079)	4.805* (2.511)	7.267** (3.233)
<i>FD<sub>2</sub></i>	-3.158*** (1.116)	-1.105 (2.988)			-3.224*** (1.105)	-0.934 (2.672)	-4.157 (3.109)
<i>Fin</i>	15.00 (14.42)	9.336 (24.59)			16.35 (13.53)	10.44 (21.83)	26.79 (31.53)
<i>Ind</i>	-4.382*** (0.915)	-6.833*** (1.735)			-4.211*** (0.919)	-6.155*** (1.861)	-10.37*** (2.420)
<i>Edu</i>	-1.508** (0.634)	-2.714** (1.195)			-1.459** (0.587)	-2.503** (1.172)	-3.963*** (1.454)
<i>Mar</i>	0.506 (0.940)	1.483 (2.314)			0.510 (0.913)	1.478 (2.314)	1.988 (2.907)
<i>rho</i>			-0.101 (0.157)				
sigma2_e				161.7*** (23.39)			
<i>N</i>	96	96	96	96	96	96	96
<i>R<sup>2</sup></i>	0.389	0.389	0.389	0.389	0.389	0.389	0.389

表 5.4 稳健性检验 II

VARIABLES	SDM		SAR	SEM
	Main	Wx	Main	Main
$FD_1$	2.305*** (0.000)	-0.223 (0.875)	1.943*** (0.000)	2.032*** (0.000)
$FD_2$	-1.915*** (0.004)	1.408 (0.423)	-1.663** (0.011)	-1.601** (0.016)
$Fin$	-1.115 (0.895)	2.907 (0.841)	-1.822 (0.744)	-2.481 (0.691)
$Ind$	-1.317** (0.014)	-2.137** (0.033)	-0.652* (0.095)	-0.861** (0.043)
$Edu$	-1.217*** (0.001)	-1.073 (0.128)	-0.957*** (0.005)	-1.112*** (0.001)
$Mar$	0.169 (0.760)	-0.325 (0.811)	0.197 (0.612)	0.169 (0.689)
$\rho$		-0.386*** (0.006)	-0.350** (0.012)	
lambda				-0.363** (0.013)
sigma2_e		55.83*** (0.000)	64.69*** (0.000)	63.37*** (0.000)
$N$		96	96	96
$R^2$		0.167	0.179	0.211

表 5.5 上游地区空间模型回归

VARIABLES	(1)	(2)	(3)	(4)	(5)	(6)	(7)
	Main	Wx	Spatial	Variance	Direct	Indirect	Total
$FD_1$	-1.065 (1.218)	-4.432** (1.812)			-0.945 (1.229)	-4.360** (1.730)	-5.305*** (1.486)
$FD_2$	1.113 (1.476)	1.927 (1.802)			1.009 (1.530)	1.894 (1.787)	2.903*** (1.012)
$Fin$	25.69** (10.91)	-1.301 (17.05)			27.04** (10.68)	-2.598 (17.56)	24.44 (19.36)
$Ind$	2.348*** (0.502)	0.753 (0.797)			2.372*** (0.511)	0.644 (0.782)	3.015*** (0.849)
$Mar$	-0.823* (0.487)	-0.865 (0.797)			-0.788 (0.502)	-0.811 (0.781)	-1.598* (0.829)
$\rho$			-0.0371 (0.142)				
sigma2_e				25.85*** (5.278)			
$N$	48	48	48	48	48	48	48
$R^2$	0.675	0.675	0.675	0.675	0.675	0.675	0.675

从表 5.5 和 5.6 的数据可知，与全样本数据稍有不同的是，上游地区和中下游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存在每增长一单位全要素生产率会显著抑制邻近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上游地区和中下游地区在空间效应方面存在溢出，上游地区的财政收入分权和财政支出分权都对邻近地区存在输出效应，而中下游地区则只有财政支出分权指标对邻近地区存在输出影响。

表 5.6 中下游地区空间模型回归

VARIABLES	(1) Main	(2) Wx	(3) Spatial	(4) Variance	(5) Direct	(6) Indirect	(7) Total
<i>FD</i> <sub>1</sub>	0.222 (0.477)	-1.132* (0.635)			0.832 (0.803)	-1.316 (0.841)	-0.483 (0.389)
<i>FD</i> <sub>2</sub>	0.241 (0.983)	2.293* (1.187)			-0.787 (1.800)	2.172 (1.882)	1.385*** (0.490)
<i>Fin</i>	-4.607 (7.205)	-2.964 (13.65)			-4.353 (6.872)	0.996 (9.874)	-3.357 (10.45)
<i>Ind</i>	1.031 (0.728)	-0.827 (0.889)			1.821 (1.375)	-1.713 (1.428)	0.108 (0.446)
<i>Mar</i>	2.705* (1.567)	-6.293*** (1.745)			6.676** (2.732)	-8.635*** (2.706)	-1.959** (0.996)
<i>rho</i>			-0.792*** (0.135)				
sigma <sub>2_e</sub>				32.92*** (7.824)			
<i>N</i>	48	48	48	48	48	48	48
<i>R</i> <sup>2</sup>	0.140	0.140	0.140	0.140	0.140	0.140	0.140

### 5.3 门槛效应

当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效应受到了自身或其他变量的影响，表现为自身或其他变量位于不同的区间会使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产生结构突变，称为门槛效应，导致结构突变的自身或其他变量被称为门限变量。具体的门槛效应模型如式（5.5）、（5.6）所示。

$$Y_{it} = \beta_0 + \beta_1 X_{it} \times I(q_{it} \leq \gamma) + \beta_2 X_{it} \times I(q_{it} > \gamma) + u_i + \lambda_t + \varepsilon_{it} \quad (5.6)$$

$$Y_{it} = \beta_0 + \beta_1 X_{it} \times I(q_{it} \leq \gamma_1) + \beta_2 X_{it} \times I(\gamma_1 < q_{it} \leq \gamma_2) + \beta_3 X_{it} \times I(q_{it} > \gamma_2) + u_i + \lambda_t + \varepsilon_{it} \quad (5.7)$$

式（5.6）为单门槛双区间的门槛效应模型，式（5.7）为双门槛三区间的门槛效应模型，其他更高门槛数量的模型结构与式（5.7）相似。在式中， $I(\cdot)$ 为

示性函数，当满足括号内的条件时  $I = 1$ ，否则  $I = 0$ ； $q_{it}$  为门限变量， $\gamma_i$  为门限值。以式 (5.6) 为例，当门限变量位于不同区间时，门槛效应模型可以表示为：

$$\begin{cases} Y_{it} = \beta_0 + \beta_1 X_{it} + u_i + \lambda_t + \varepsilon_{it}, q_{it} \leq \gamma \\ Y_{it} = \beta_0 + (\beta_1 + \beta_2) X_{it} + u_i + \lambda_t + \varepsilon_{it}, q_{it} > \gamma \end{cases} \quad (5.8)$$

上式表明，当门限变量位于不同的区间，解释变量  $X$  对被解释变量  $Y$  的影响系数不同。检验是否存在门槛效应的原假设为  $H_0: \beta_1 = \beta_1 + \beta_2$ ，备择假设为  $H_0: \beta_1 \neq \beta_1 + \beta_2$ ；通过 LR 统计量进行假设检验，LR 统计量表示为：

$$LR(\gamma) = \frac{SSR' - SSR(\hat{\gamma})}{\hat{\sigma}^2} \quad (5.9)$$

其中， $SSR'$  为  $\beta_1 = \beta_1 + \beta_2$  约束下估计的残差平方和， $SSR(\hat{\gamma})$  为无约束下估计的残差平方和，如果原假设成立，则  $SSR' - SSR(\hat{\gamma})$  与 0 无显著区别；反之，若  $SSR' - SSR(\hat{\gamma})$  显著不为 0，则说明备择假设成立，存在门槛效应。 $\hat{\sigma}^2 \equiv SSR(\hat{\gamma}) / n(T-1)$ ，为扰动项方差的一致估计量。判断多门槛效应与单门槛效应的过程与上文类似。

在上文的异质性分析中，为了进一步探究其中的原因，在空间杜宾模型的基础上进行门槛效应检验，考虑到金融信贷水平可以代表地区的资金活跃性，因此将金融信贷水平作为门槛变量，对财政分权对黄河流域农业高质量发展影响的非线性进行分析。为防止极端值的影响，论文将门槛变量的搜索范围控制在 5%-95% 之间。

检验的结果显示，以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为被解释变量时，单一门槛和双重门槛的 F 统计量均在 0.01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而三重门槛的 F 统计量不显著，说明存在两个门槛值。估计结果如表 5.7 和图 5.1 所示。

表 5.7 农业全要素生产率视角的门槛效应检验

门槛数量	农业全要素生产率	
	F 统计量	P 值
Single	41.80***	0.00
Double	37.95***	0.00
Triple	-	-

表 5.8 门槛回归结果

	(1) FD1	(2) FD2
Thrs1	0.004*** (-2.96)	0.010** (2.66)
Thrs2	0.186 (-1.33)	0.104 (1.64)
Thrs3	0.008*** (2.75)	0.009*** (-2.70)
_cons	0.009*** (2.66)	0.009*** (2.66)
N	96	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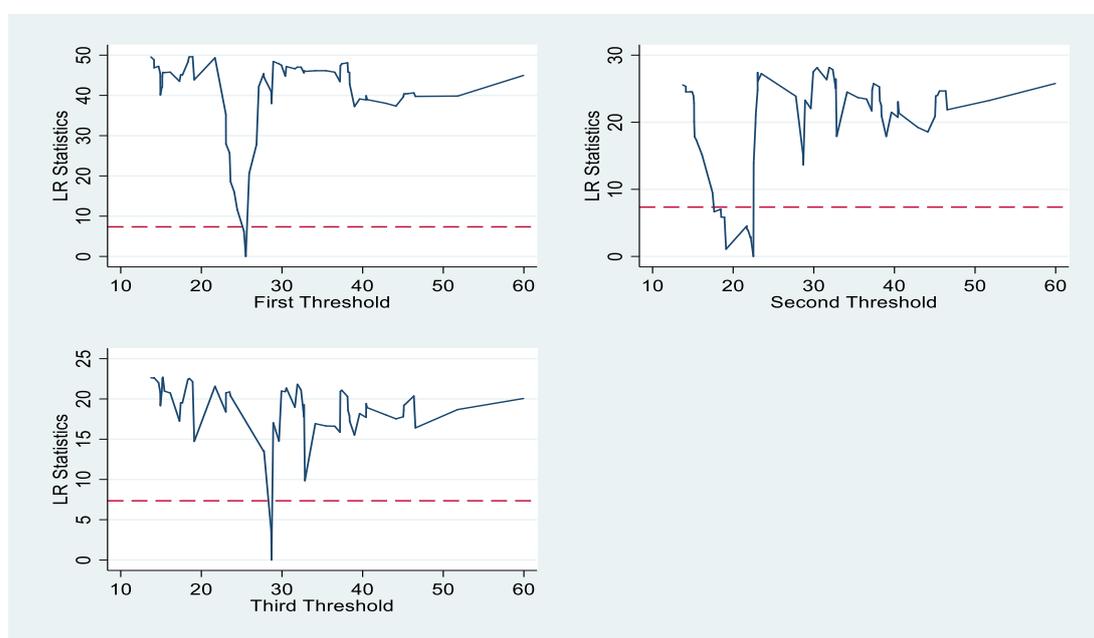


图 5.1 门槛值与置信区间

表 5.8 是门槛回归的最终结果，表中数据分别表示第一个门槛值前后和第二个门槛值后财政分权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系数。在模型中，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作为被解释变量，门槛值左右的系数符号相反，但都显著，说明当一个地区的金融信贷水平较低时，适当的财政分权会促进当地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而当越过门槛值，财政分权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就会变为负。这也解释了不同地区财政分权水平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不显著这一现象，上游地区多属于生态保护区，金融水平较低，导致财政分权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正负相抵。

图 5.1 展示了被解释变量的门槛值与门槛区间。

## 6 研究结论、政策建议及展望

### 6.1 研究结论

在新形势下，财政权力下放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联系已成为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通过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我们可以为进一步深化我国的财税制度，推动我国的高质量发展提出建议。基于此，本文在分析了财政分权影响农业高质量发展作用机制的基础上，利用黄河流域八省区 2009-2020 年省（市、自治区）的样本数据，实证检验了财政分权对农业高质量发展影响作用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具体结论如下：

第一，从全要素生产率来看，在测算了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后，通过平均值等数据可知黄河流域八省区拥有较为平稳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沿黄河流域的各省份在环境规制方面具有一定的政策限制，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更能代表。数据测算可知，黄河流域全流域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值较为稳定，都在 0.8 左右，上游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要低于中下游地区，这存在地区自身的地域差距以及经济发展的先天优势。

第二，从空间杜宾模型来看，本文采用空间权重矩阵并借助时空双固定的空间杜宾模型（SDM），使用 2009-2020 年 8 个省区的数据分析了财政分权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总体影响和空间效应。从模型结果来看，财政分权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总体呈抑制作用，并通过了稳健性检验。基于不同财政分权指标的空间效应分解表明，不同财政分权指标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有差别的空间效应。其中财政自主度分权指标更侧重于对本地区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财政支出分权指标更侧重于对邻近地区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而稳健性检验中的财政收入分权指标具有双促进作用，在促进本地区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同时，也会促进邻近地区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通过异质性分析可知，中上游地区与下游地区的经济性差异较为明显，黄河流域绵延横亘中华大地，地区间经济社会发展差距较大，因此，财政分权体制下的地方政府不能作为一个同质的整体来分析，而是要充分分析和考虑地区差异。

第三，从财政分权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非线性检验来看，利用门槛回归

模型，以金融信贷水平作为门槛变量，分析财政分权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是否存在非线性。结果显示，高金融信贷水平的省份财政自主度可以促进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低金融信贷水平的省份财政自主度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为负；与财政自主度相反的是，财政支出分权在低金融信贷水平的省份会产生促进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而在高金融信贷水平的省份则会产生显著的抑制影响。

## 6.2 政策建议及展望

基于本文的研究结果，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完善财政分权顶层设计。财政分权作为中国经济管理中一项重要的制度工具，它在提高经济发展质量方面所起到的积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理念不断变化，发展要求也越来越高，因此，推动分权改革时，财政分权上层设计有待完善。完善顶层设计也能够更好地去引导财政分权在地方经济尤其是农业经济的发展，财政自主度的划分清晰可以积极促进地方带动产业经济发展，在黄河流域这样的农业优势区域更好针对性地带动农业高质量发展，支出分权也可以使政府明白各自的责任，建立责任机制，及时警示各级政府，减少其对于黄河流域农业经济的负向抑制作用。在完善顶层设计方面，一是厘清中央政府权力范围与支出责任。目前，在我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财政改革的博弈中往往存在权力重叠或缺位的现象，导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纵向失衡，以及财政改革与财政改革之间的失衡。收入和支出的赤字继续增长。因此，在推进责任分担改革的过程中，需要进一步明确中央和地方的支出权责范围，亮明公平公开的规范原则。各级政府要将政府职能与支出责任挂钩。第二，支持财政分权和法治。财政法治的缺失将导致财政系统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管权的混乱，进而导致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权力和责任的不确定性，关系混乱，权威薄弱，执行能力欠缺。因此，在推进分权改革的过程中，要继续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法律法规，完善财政分权的法律体系，支持财政分权制度依法实施。第三，要加强预算管理。在约束制度内，预算管理针对的是各级政府主体的财政行为，发挥其“代理人”作用。因此，在推进简政放权改革过程中，要在准确界定各级政府支出权责范围的基础上，按照“取之于民用之

于民”的原则，平衡规范化、民主化高效公开的预算编制、执行、监督和审查，有效遏制财政腐败行为，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效保障。

第二，重视国家政策的引导功能。积极促进三农产业转型升级，尽量消除各区域间的三农产业壁垒，解决同区域间的产业同构、过度建设以及无用消耗等问题，统筹规划好区域发展，提高产业效率，使财政分权能够更有空间去调整农业产业的政策及红利的实现，发展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政府和相关企业要多进行互动沟通，有更多有效交流，政府可以充分利用政策去协调区域间的发展战略，形成差异化的定向的区位战略。在这期间要注意保持社会稳定，无论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抑或是农业高质量发展都是需要长期进行的，过程中会出现一段“阵痛期”，国家和政府要注意防范风险，对农民积极引导宣传。财政分权在现实经济增长中的积极影响，主要表现在促进政府直接控制的经济增长目标，对于以市场因素为主，而又有政府间接干预的计划外经济增长，其作用较小，并不明显。因为地区的经济条件差异，其对财政支出责任的规定会存在较大差异。所以在国家财政分权制度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地方各级政府部门都应该更多创造良好的制度条件，适当降低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的地方政府干预，减少重复建设，减轻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而与此同时，地方税制度也应该进一步健全，以降低相关农业政策刺激下对各地政府发展所造成的恶果。

第三，因地制宜调整财政分权力度。由于我国不同地区资源禀赋和经济水平的差异，不同地区的财政分权程度不同，对经济发展质量的支撑作用也不同。因此，在推进分权改革的过程中，财政分权工作应因地制宜，调整财政自主度，以便于更好发挥财政分权对高质量发展尤其是在农业方面的积极作用，减少财政分权支出分权对于地区资源的抑制输出，能够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有一个针对性的提高。首先，分清地方政府支出责任。由于地方经济发展状况不同，其对财政支出责任的划分也有很大差别。各地当地政府纷纷提出、财政收入与发展情况之间的区别，实行“一刀切”财政分权政策，损害了公平与效率原则，这会直接导致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同时，要考虑区域之间财力差距对中央与地方关系产生影响，建立起合理的转移支付制度，实现区域间利益协调，使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能得到相应的激励，从而保证社会和谐稳定。所以，以

公平与规范为前提，支出责任要按区域财政收入水平安排，明确支出责任，具体职责由各具体职能部门承担。为了保证收入分配合理有效，需要发挥财政政策对不同区域之间的激励作用。二是灵活使用财政手段。同时也可考虑运用财政支出转移支付的方法来平衡收入差距，从而缩小本地区与发达地区之间的贫富差距。比如对农业相关产业收入水平不高的区域来说，地方政府可通过税收减免、农业税抵扣及其他税收优惠政策，以期对该区域农业经济及地方发展有所裨益，加大区域内财政收入分流力度，着力拉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三是要合理确定财政支出责任。在财政自主权不高的区域，地方政府可通过开发地方行为主体，辅助税种等方式刺激经济的发展，增加地区财政收入分权。由于我国地域广阔，各地区之间的农业生产力差异很大。三是建立调节税负。由于每个属区都有自己的产业优势和市场机会，因而各行业的竞争压力不同，导致其税收收入具有较大差异。当某一区域支出责任没有改变时，其所属区内企业种类多，数量大、结构与规模会对区域内税收来源产生影响，继而影响到区域内财政收入。因此，要根据不同经济区域的特点，制定差别化的税收政策，以促进本地区的发展。伴随着企业向某一属区搬迁或设立，区域内税收资源将随之改变，各自所属地区收入分散程度将随之改变。如地方政府投资扶持给地区发展带来较好税源。目前，地区可以适当地采取宽松的农业税收政策，如税收减免、免税和税收减免，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第四，国家要继续加强财政分权改革。特别是在当前新常态经济条件下，中央政府应该更多地利用地方政府的财政资源，利用地方政府的信息资源优势。这是改善当地农业资源、鼓励农业产出的最有效手段，也是促进经济增长质量的方式。另一方面，区域财政分权的改革措施应与经济发展的需要相适应，中央转移支付应更倾向于上游地区发展的需要，以实现区域转移支付的合理分配，从而实现区域金融资源促进经济增长的帕累托最优条件。除此外，现阶段还应重点突出这两个抓手：一，必须从我国具体国情和现实需要出发，权衡经济数量和质量。坚决不能用破坏经济质量来换取经济数量上的增长。建立和完善对地方政府官员的科学综合评价体系等，不仅是 GDP 指标，还需要排查所需要付出的环境代价，尤其农业是细水长流型产业，环境成本是比较重要的，是需要考虑在政府对经济效益的规划中的。另外还需审视经济发展潜力，审视地方政

府经济行为是否规范等，比如在制定农业农村计划中，不可盲目跟随典型，应从实际出发，体量本地情况，估计发展潜力，量身定制发展计划，从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各方面出发，推进农业农业高质量发展。由此，通过构建合理的官员晋升评价体系，调动官员主动提升经济质量的积极性。二是建立更公平、更有效率的官员晋升机制，优化总体布局。我国目前各区域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发展差距。对较发达地区来说，更要对经济发展质量进行提升；对比较落后的地区来说，促进经济数量的增长，并且为进一步提高经济质量打好基础，是切实可行的发展道路，财政分权改革是能够通过不同的财政自主度、收入和支出分权的划分，合理针对不同发展程度的地区，黄河流域区域就是在财政分权的调节下，通过政策对于自主度的鼓励和支出分权的控制，积极提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从而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所以，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应采取不一样的官员考核体系，这样才能更公平，也可以减少各区域之间不良竞争，推动地区间合作，优化总体布局。

除了给予建议外，本文存在的不足主要体现在并未体现具体的环境因素所引起的经济质量的增减，也就是未体现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原因在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在现在的条件下不好估计计算，各学者对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观点也是褒贬不一，因此未来也会更多的从环境污染等方面去研究高质量发展和财政分权的关系。

## 参考文献

- [1] Adam Smith. *The Wealth of Nations*(1776)[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6(reprint): 287.
- [2] Arrow K J. The 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Learning by Doing[J].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962, 29(3):155-173.
- [3] Barro R J.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Economic Growth[J]. *Working Papers Central Bank of Chile*, 2002, 5(2):17-36.
- [4] Beramendi P, Rogers M.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the distributive incidence of the Great Recession[J]. *Regional Studies*, 2020, 54(7):881-896.
- [5] Blanco F, Delgado F J, Presno M J.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Policies in the EU: A Comparative Analysis through a Club Convergence Analysis[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olicy Analysis: Research and Practice*, 2020, 22(3):226-249.
- [6] Bon N V. The Effect of FDI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scal Decentralis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Vietnam: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Provincial Data[J]. *Theoretical Economics Letters*, 2019, 09(6):2093-2109.
- [7] Cheng Y, Awan U, Ahmad S, et al. How do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ffect the environment? A story of 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sustainable growth[J].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 Social Change*, 2021, 162(1):78-99.
- [8] Gemmell N, Kneller R, Sanz I.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Spending versus revenue decentralization[J]. *Economic Inquiry*, 2013, 51(4):1915-1931.
- [9] Iimi A. Decentraliz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revisited: an empirical note[J].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2005, 57(3):449-461.
- [10] Julia W. Skill Intensity in Foreign Trade and Economic Growth[J]. *Empirica*, 2005, 32(1):117-144.
- [11] Liu L.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the imbalance between consumption and investment in China[J]. *The Annals of Regional Science*, 2020, 68(4):1-17.

- [12] Luo W Q, Chen S.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Public Education Provision in China[J]. *Canadian Social Science*, 2010, 6(4):29-37.
- [13] Oates W E. *Fiscal Federalism*[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2:44-65.
- [14] Oates W E. The Effects of Property Taxes and Local Public Spending on Property Values: An Empirical Study of Tax Capitalization and the Tiebout Hypothesis[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69, 77(6):957-971.
- [15] Pauly M V. Income redistribution as a local public good[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1973, 2(1):35-58.
- [16] Qian Y, Weingast B R. Federalism as a Commitment to Preserving Market Incentives[J]. *Working Papers*, 1997, 11(4):83-92.
- [17] Qiao B, Martinez-Vazquez J, Xu Y. The tradeoff between growth and equity in decentralization policy: China's experience[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8, 86(1):112-128.
- [18] Siburian E M.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regional income inequality: evidence from Indonesia[J]. *Applied Economics Letters*, 2020, 27(17):1383-1386.
- [19] Solow R. M. 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56, 70(1):65-94.
- [20] Su C W, Umar M, Khan Z. Does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eco-innovation promote renewable energy consumption? Analyzing the role of political risk[J].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2021, 751(3):78-103.
- [21] Tao, Zhang, and, et al.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public spending,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1998.
- [22] Tiebout Charles M. A Pure Theory of Local Expenditures[J].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5): 416-424.
- [23] 安树伟,李瑞鹏.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与推进方略[J].*改革*,2020(01):76-86.
- [24] 钞小静,薛志欣.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逻辑与实践机制[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48(06):12-22.

- [25] 陈昌兵.新时代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动力转换研究[J].上海经济研究,2018(05):16-24+41.
- [26] 陈晨,刘冠军.实现高质量就业与提升人力资本水平研究[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9(03):42-50.
- [27] 陈诗一,陈登科.雾霾污染、政府治理与经济高质量发展[J].经济研究,2018,53(02):20-34.
- [28] 储德银,费冒盛.财政纵向失衡、土地财政与经济高质量发展[J].财经问题研究,2020(03):75-85.
- [29] 崔盼盼,赵媛,夏四友,鄢继尧.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与高质量发展测度及时空耦合特征[J].经济地理,2020,40(05):49-57+80.
- [30] 樊杰,王亚飞,王怡轩.基于地理单元的区域高质量发展研究——兼论黄河流域同长江流域发展的条件差异及重点[J].经济地理,2020,40(01):1-11.
- [31] 冯波,郭巍.长江经济带与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系统思考与建议研究[J].价格理论与实践,2022(01):148-151+175.
- [32] 付丽娜,陈晓红,冷智花.基于超效率 DEA 模型的城市群生态效率研究——以长株潭“3+5”城市群为例[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23(04):169-175.
- [33] 高泽阳.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财政分权激励效应与优化路径[D].山西财经大学,2022.
- [34] 龚锋,雷欣.中国式财政分权的数量测度[J].统计研究,2010,27(10):47-55.
- [35] 龚强,王俊,贾坤.财政分权视角下的地方政府债务研究:一个综述[J].经济研究,2011,46(07):144-156.
- [36] 郭健,张明媛,于倩,徐超.财政分权与高质量发展——兼论分权的“适度区间”[J].财政研究,2021(11):86-101.
- [37] 郭露,徐诗倩.基于超效率 DEA 的工业生态效率——以中部六省 2003—2013 年数据为例[J].经济地理,2016,36(06):116-121+58.
- [38] 郭庆旺,贾俊雪.财政分权、政府组织结构与地方政府支出规模[J].经济研究,2010,45(11):59-72+87.
- [39] 郭然,梁艳.环境规制、财政分权与经济高质量增长[J].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43(3):51-61.

- [40] 郭新茹,陈天宇.文化产业集聚、空间溢出与经济高质量发展[J].现代经济探讨,2021(02):79-87.
- [41] 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研究所课题组.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J].宏观经济研究,2019(02):5-17+91.
- [42] 郝金连,王利,孙根年,孙凡凯,王东华.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空间格局演进——基于新发展理念视角[J].中国沙漠,2022,42(06):266-276.
- [43] 贺晓宇,沈坤荣.现代化经济体系、全要素生产率与高质量发展[J].上海经济研究,2018(06):25-34.
- [44] 侯世英,宋良荣.财政分权、地方政府行为与经济高质量发展[J].经济问题探索,2020(03):33-44.
- [45] 胡佳.财政分权与创新环境:影响估计、异质性与非线性特征[J].地方财政研究,2022(04):82-91.
- [46] 贾洪文,张伍涛,盘业哲.科技创新、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高质量发展[J].上海经济研究,2021(05):50-60.
- [47] 江红莉,蒋鹏程.财政分权、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质量[J].财政研究,2019(12):75-86.
- [48] 金凤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协调推进策略[J].改革,2019(11):33-39.
- [49] 赖一飞,谢潘佳,叶丽婷,马昕睿.我国区域科技创新效率测评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超效率 SBM-Malmquist-Tobit 模型[J].科技进步与对策,2021,38(13):37-45.
- [50] 李福柱,苗青.黄河流域城市生态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的空间网络特征[J].统计与决策,2022,38(05):80-84.
- [51] 廖果平,秦剑美.绿色技术创新能否有效改善环境质量?——基于财政分权的视角[J].技术经济,2022,41(04):17-29.
- [52] 刘亦文,胡宗义.中国碳排放效率区域差异性研究——基于三阶段 DEA 模型和超效率 DEA 模型的分析[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5,37(02):23-34.
- [53] 吕程.中国财政分权对经济发展质量影响研究[D].辽宁大学,2021.
- [54] 彭冲.财政分权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D].山东财经大学,2022.

- [55] 乔翠霞,刘韵致,杨晨曦.FDI 对农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财政支农的调节效应分析[J].东岳论丛,2023,44(05):148-159+192.
- [56] 冉启英,王健龙,杨小东.财政分权、环境分权与中国绿色发展效率——基于地级市层面的空间杜宾模型研究[J].华东经济管理,2021,35(01):54-65.
- [57] 任保平,付雅梅,杨羽宸.黄河流域九省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评价及路径选择[J].统计与信息论坛,2022,37(01):89-99.
- [58] 任保平,李禹墨.新时代我国高质量发展评判体系的构建及其转型路径[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47(03):105-113.
- [59] 任保平,张倩.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设计及其支撑体系构建[J].改革,2019(10):26-34.
- [60] 邵帅,张可,豆建民.经济集聚的节能减排效应:理论与中国经验[J].管理世界,2019,35(01):36-60+226.
- [61] 师博,任保平.中国省际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测度与分析[J].经济问题,2018(04):1-6.
- [62] 宋美喆,刘寒波,叶琛.财政分权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省直管县”改革的准自然实验[J].经济地理,2020,40(03):33-42.
- [63] 宋瑞,胥英伟,史瑞应.黄河流域旅游产业效率评价与驱动力分析——基于 DEA 方法和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研究[J].中国软科学,2022(11):26-36.
- [64] 宋跃刚,郝夏珍.数字经济对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门槛和空间溢出效应研究[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2,50(01):48-58.
- [65] 苏春红,李真.财政分权、支出偏向与城乡融合发展[J].经济问题探索,2022,47(06):107-123.
- [66] 孙开,温馨.中国财政分权的多维测度与空间分异[J].财经问题研究,2014(10):72-78.
- [67] 田野,黄进,安敏.乡村振兴战略下农业现代化发展效率评价——基于超效率 DEA 与综合熵值法的联合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21(03):100-113.
- [68] 魏敏,李书昊.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测度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8,35(11):3-20.
- [69] 徐福祥,徐浩,刘艳芬,赵常兵,刘凯.黄河流域九省(区)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 治理水平测度与评价[J].人民黄河,2022,44(06):11-15.
- [70] 徐辉,师诺,武玲玲,张大伟.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及其时空演变[J].资源科学,2020,42(01):115-126.
- [71] 徐永胜,乔宝云.财政分权度的衡量:理论及中国 1985—2007 年的经验分析[J].经济研究,2012,47(10):4-13.
- [72] 薛阳,薛冲,冯银虎,胡丽娜.财政分权、地方政府债务与区域创新[J].统计与决策,2022,38(11):155-158.
- [73] 杨志安,邱国庆.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关系——基于地区发展与民生指数视角[J].财政研究,2019(08):27-36.
- [74] 张翠菊,张宗益.中国省域产业结构升级影响因素的空间计量分析[J].统计研究,2015,32(10):32-37.
- [75] 张瑞,王格宜,孙夏令.财政分权、产业结构与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J].经济问题,2020(09):1-11.
- [76] 赵建国,齐默达,关文.财政分权赋能经济发展的新路径——基于技术创新路径的检验[J].财政研究,2021(11):73-85.
- [77] 赵涛,张智,梁上坤.数字经济、创业活跃度与高质量发展——来自中国城市的经验证据[J].管理世界,2020,36(10):65-76.
- [78] 赵悦彤,陶树美.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路径探析[J].焦作大学学报,2022,36(02):73-77.

## 致 谢

三年光阴转瞬即逝，很感谢导师耐心的陪伴，让我能够学习到很多，也很感谢一直在身边的室友和同学们，他们像阳光一样耀眼。最后感谢学校和各位专业课老师的教导，让我拥有这样美好的一段经历。

这篇论文的完成离不开我敬爱的导师韩妍老师，她为了我的学习付出了很多心血，是她的孜孜教诲让我能够顺利完成这篇论文，在论文完成的过程中，是韩老师一步步指导我思路，提出了很多有用的意见。这三年的学习与陪伴，韩老师让我第一次感受到什么叫亦师亦友，她会在我需要的时候及时出现，我十分感谢她，韩老师永远是我的良师和益友。

其次，我还要感谢在一起学习三年的室友和同学，三年时光是这么短暂，入学那天还恍如昨日，转眼间便要离别。我们一起度过的时光是那么美好，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聊八卦，打牌，真希望这样的日子不会结束，大家以后都要加油。

我还要感谢我们专业的郭三化、孙晓娟及申社芳老师，还有学院的各位专业课老师和研秘老师，是他们的辛勤教育成就了我的学习功底，是他们的认真负责培养了我求实严谨的作风。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家人和朋友，没有他们的支持我不可能来到这里，他们的教育和鼓励是我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尤其是我的父母，一直相信我爱护我，努力为我营造一个好的学习环境，我只能用以后的努力回报他们，我永远爱你们，爸爸妈妈。

追风赶月莫停留，平芜尽处是春山！